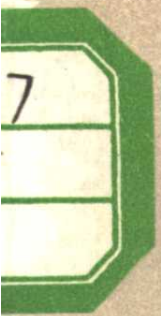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辉



目 录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1
发扬民主 畅所欲言	61
纪念孙中山	76
关于人民陪审员制	80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与扩大民主生活	85
江西省的山区建设和林业建设	97
学习生活和政治协商	105
林业工作的情况、问题和改进措施	109
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124
新春寄语	127
后 记	刘元彦 130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此文所述，是我从一九二九年开始反蒋起至一九四九年起义止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史实。这是中国大变动的二十年，我所经历的事情本来是不不少的，但因历来所存资料于成都解放前夕全为胡宗南部所毁，而当年经办其事的几个朋友又皆去世，故不可能全部搜集写出。这里所写的，只是脑中记忆的片断。在整理过程中，虽然曾向有关朋友广事征询，加以补充校正，仍觉不够完整和具体，有的可能还不够准确，希望当年同道的朋友予以指正！

我走到人民阵营经历的道路，是由反蒋而亲共，由亲共而起义。我在这条道路上，前后走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我在政治上由假到真、由黑暗到光明的发展过程。现在，把我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扼要加以叙述，以供现代史料工作者的参考。

一、从反蒋斗争谈起

我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说实话，当年的动机并不是为

* 本文写成于一九六二年一月。

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具体言之,在一九三〇年以前,蒋介石还在军阀混战中处于被围攻的地位,而我在四川的实力正在向上发展,那时的反蒋,是为了扩大个人的政治局面: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一九三〇年以后,蒋介石的统治已在全国确立,力量逐步伸入四川;而我在政治上又逐渐转入逆境,尤以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頌尧诸部与刘文辉作战)失败、退守西康以后,处境最艰,朝不谋夕。此后的反蒋,则是为了保持残存的地盘,以便重整旗鼓,再图发展。

我过去的政治支配欲所以如此强烈,这也是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一九一六年我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四川搞军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仅十年来的光景,便由上尉参谋升到军长。旧中国是枪杆支配政权的。我手中掌握了一支武力,于是四川省主席也、川康边防总指挥也、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一齐送上了门,俨然成为川康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旧中国的军人,照例是兵愈多,官愈高,政治野心就愈大,我自然也不会例外。我懂得武力是扩大个人政治局面的重要资本,故升至旅长时即开始大力扩军。而扩军又是和内战紧密联系在一起,每打一次内战就要扩编一次队伍。川军刘禹九、杨春芳等部几万人,就是在战场上经过较量后被我编并的。曾经有一个时期,被编并的队伍比我的基本队伍还多,形成干弱枝强的局面,要经过整理训练,从组织上思想上彻底加以改造。我办有各级军事学校,从军士而尉官、校官以至将官都须参加受训;从而他们同我的关系,既是长官与部属,又是老师与学生。同时我对人事任免权抓得很紧,自连级以上军官都是由我亲自选拔。凡此种种,无非是要使所有部属都死心塌地为我个人效忠。军队光是有人不

行,还得把它装备好。我是从两个方面去解决的:一是花钱向外国购买;一是自办兵工工业。为了大量制造武器,开矿山、办工厂、组织技术力量,曾经费了很大的事。我从小就从线装书上知道“为政在人”这一条,所以付出很大精力去罗致人材,最盛时期,我这个集团的文武干部,包括十几个省籍,欧美、日本各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南北各大学的大学生,无所不有。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且要花大量的钱。因此,财政问题又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扩大防区。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拚命地争城争地。四川军阀混战十六年,大多为此。我在这方面,当然也是“当仁不让”,每打一次内战即扩大一次防区。在退守西康之前,据有川西、川南全部和川东、川北的一部。在自己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这是题中应有之文。而盛产盐糖的五通桥、自流井和资中、内江等地又都在我的防区内,盐糖税收为我和刘湘所瓜分。因此,搜刮的财富也较其他四川军人为多。但是我的政治局面日益扩大,支出日益增多,仍然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又开银行,办实业,进一步扩大剥削,去填补财政上的无底洞。一九三三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终日焦头烂额,无法应付;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二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极盛时代。当时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亦为我的势力

所控制。少年得志，不可一世。我后来曾用三句成语来描绘当时的心情：“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因此，我那时的主意是：内外并举，左右开弓，即一面在夔门以内加紧消灭敌对势力，去实现统一四川的夙愿；一面乘滇黔军人内讧的机会，支持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打回贵州，为控制西南奠定基础。但是统一四川，控制西南，仅是我的政治野心的一部分，最终目的还在于向全国范围内扩张。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利用和支持下，互争政权、大起内讧，不惜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向绝地。不同的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被压迫的人民是投入革命，从革命斗争中去求得自己的解放；而我呢，属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当权派，自然是参加国民党内讧，从内讧的角逐中去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我认为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让我们这一群人来掌握中国政权。这次反蒋，是承桂系和冯系西北军反蒋失利之后而发动的。蒋在军事上本来占上风，同时我们事前的组织工作又没有作得到家。因此，战争爆发之后，冯玉祥的西北军态度不明，阎锡山的晋绥军按兵不动，两湖同情我们的军人又中途被蒋介石收买，而我的部队又远在四川，一时出不来，以致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陷于孤军作战，不到一个月功夫就告失败了。这个时候，我同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是水火不相容；

但因蒋正忙于对付阎、冯，无力西顾，而我亦因向中原初试锋芒即蒙不利，不能不沉机观变；所以彼此也就都暂时不了了之。一九三〇年三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组织讨蒋联军，爆发了中原大战，七月汪精卫北上，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与阎、冯、桂合作组织政府，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唱对台戏。我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决不能放过。因此，当阎、冯、桂酝酿讨蒋向我征求意见时，即极表赞成；并暗中积极准备出兵进攻武汉，以配合阎、冯联军的中原大会战。不过鉴于前一次反蒋失败的教训，火色不能不看老一点，所以直到扩大会议举行的前三天，即九月六日才发出鱼电公开反蒋。我满以为这一下蒋介石一定会被打下去。谁知张学良忽然改变骑墙态度，倒向蒋介石一边，率领奉军入关；因而扩大会议一哄而散，这次反蒋又以失败而告终。

一九三〇年扩大会议的天折，是国民党内部反蒋斗争的最后一次失败。从此以后，蒋介石成了中国的大独裁者。我曾有过两度反蒋的历史，同蒋已经是冰炭水火，摆在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向蒋介石投降，作他的驯服工具；二是脱离政治生活，到外国去作寓公；三是坚持反蒋斗争，从斗争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前两条道路，同我这样一个人是格格不入的，当然不愿意走。事实上要走也是走不通的。因为蒋介石向来欺软怕硬，你有本事整他，他便将就你；你若退让，他就叫你活不下去。势成骑虎，欲罢不能，只有走最后一条路，同蒋介石斗争到底。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坚持反蒋斗争的原因。

二、走亲共的道路

反蒋失败，转而亲共，亲共之后，继续反蒋。这是我在解放前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前已言之，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因为，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压迫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蒋的势力已经深入四川的时候，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自从一九三〇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的实力集团垮的垮、降的降，已经不成局面，国内可与蒋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依靠。因此，我决定走亲共的道路。但是仅有主观要求也不成，同时又有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一切反对蒋政权而愿意向人民靠拢的人们敞开了大门；其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革命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是凭借了这两个有利条件，所以我的亲共也就由假到真，即由原来利害上的暂时利用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长期依靠，终于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了人民阵营。

我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于一九三八年，即抗日战争发生后的第二年。四川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现在，就我脑中印象最深而又认为重要的事实，略述如下：

一九三八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

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道经成都，与我会面于我方正街住所。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志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希特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诱降的时候，投降主义的逆流泛滥于国民党的权贵之中，抗日形势非常险恶，所以我们这次的话题也是以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从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已初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我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经过这次会晤，我同党相互间都有了了解，为我进一步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和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第二次会晤。时距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不久，蒋政府的各军政机关都已疏散下乡，抗战亡国论在国民党当权派中又复抬头。故我们这次会晤，也主要是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他们几位向我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释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谈是有重大影响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第一次见面。这次会晤，事前是通过民盟的朋友联系的。为了避开蒋介石特务的耳目，时间在深夜，地点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宅，在座只有周和我二人，约谈了一小时，谈完后周马上走了。周在谈话中给我扼要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则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他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

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最后他还给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说，团结就是力量，须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团结是为了斗争。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现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以上是引述周谈话大意）周的这一番话，使我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力量。经过这次会晤以后，我同党的关系，也就由一般联系开始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我经常联系，并设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我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我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读到了。因此，我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这个电台的设置，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我事前就料到蒋介石的特务要来进行破坏，故把它安在雅安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王少春和我直接联系，如我离开雅安时则指定我的两个参谋长张伯言和杨家桢同他联系；除此以外，王不同其他任何人打交道，以保持秘密。当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蒋介石的特务即有所觉察。他们暗中由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设在雅安城内，正要进行侦察和干扰，我得报后，立即派兵搜出予以没收；并警告蒋介石派在二十四军军部搞特务活动的政训处主任丁国保说：“现在奸人在雅安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如果以后

再有此种不法行为，定要严办。”他们由于没有抓到把柄，又加上我这一警告，以后也就再没有在这上面捣乱了。所以这个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经历将近八年而没有被破坏。解放后，王少春到重庆高兴地向我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和一九四四年六、七月间，我曾派代表杨家桢到重庆和王若飞先后有过两次会晤。在那些年月里，正是蒋介石集团向我节节进逼的时候，不是以对藏用兵为名要把我的部队消灭于康藏高原，就是要派伪中央军进驻西康来控制我的行动，我一年到头都在紧张中过日子。王若飞通过我的代表每次都给我分析了情况，出了主意。他告诉我，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本性是外强中干，我如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就会知难而退。他一再给我打气，叫我不要松劲。我听了朋友的话，坚持了反蒋斗争，终于一个个的难关被克服下去了。这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我的有力支持。

一九四五年二月间，张友渔到成都，党派他帮助我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每天清早就到我方正街住所，给我系统地分析世界和中国的革命形势，讲解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连续达一个多月之久，我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学校。

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间，正值旧政协会议闭会后不久，周恩来将要离开重庆去南京的时候，他嘱民盟的朋友转达我：政协决议能否实现，联合政府能否组成，要看蒋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现在还不能定。但是无论怎样演变，斗争总是不可免的，对蒋介石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他还叫民盟这位朋友特别提醒我，说今后的政权问题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谁也

站不住。他鼓励我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点，以取得人民的支持。我体会到：周的这一番话，不仅是向我说明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同时也给个人指明了政治前途。

在这些年月里，我在政治生活中经历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是，如上所述，共产党向我伸出友谊之手，诚恳地关怀我，热情地支持我；而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则视我若眼中钉，不断地在政治上排斥我，在军事上压迫我，必欲去之而后甘心。这种切身经历驱使我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亲近，而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则越来越乖离了。

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我走上亲共道路以后，在政治上已没有孤立的感觉，因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勇气也就更增加了。一九三八年夏季，我的代表曾庶凡从汉口回成都告诉我：“武汉守不住，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形势很清楚，蒋的大队人马一西上，首先就要控制川康地盘，而他要实现这一目的，又必然要消灭地方力量。我们则与蒋的利害恰相反，必须保持自己力量，继续控制川康地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舞台上立足，也才有条件拥护共产党抗日。这就使得我们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场斗争，应该怎么办？这是我朝夕困心衡虑的问题。我知道蒋介石消灭地方力量的办法，向来是各个击破，我们要对付他，就必须团结西南地区同蒋对立的实力派，共同行动，互相支援，才有办法。同时中共的领导人也一再告诉我，团结就是力

量。因此，团结西南地方实力派就成为我们反蒋斗争的重要关键。当时贵州省的地方势力已被蒋整垮，该省几乎完全为蒋系势力所控制，工作无从下手；西康省的军政大权则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没有问题，只是如何巩固内部而已。因此，团结工作的重点在于川、滇两省，其中四川尤为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四川是西南政治、经济的中心和西康的门户，同时又是我出生和发迹的地方，在政治上社会上有较深厚的基础，所以我人在西康，而心实未尝一日忘情于此。现在，四川已成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彼此都是势所必争。而当时川省内部情况又非常复杂，事情很不好办。根据我当时的分析，四川军政界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是属于顽固派，他们是坚决反共、反人民，死心塌地为蒋王朝效忠的；二是属于中和派，他们既想做蒋介石的官而又怕蒋把他们的力量吃掉，既反共而又不为已甚，在政治上总是踟蹰瞻顾，依违于拥蒋和反蒋之间；三是属于元老派，他们多年在野，大多习于明哲保身，意态消沉，与现实政治生活几乎脱节，但在地方上还有一些偶像作用；四是属于高干派，他们是四川军政界的高级干部，在地方上的发言权虽不大，但是对一些地方首脑人物却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其中有些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能起积极的作用。我认为，头一派是斗争的对象，后三派是联合的对象。根据这个分析和长期的体察，我觉得四川地方实力派中的邓锡侯、潘文华是应当合作，也是可能合作的。尽管我和他们之间对政治上的看法有所不同，对四川地方的权利之争也互有矛盾，但是大家都想保持四川地盘和自己实力，不愿意被蒋吃掉，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正因为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所以我们三人在反蒋斗争上是长期合作的。当然，由于个人利害上

的冲突，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有时也是同床异梦，互相倾轧，但是涉及到共同的利害问题，又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了。从一九三八年拒绝张群作四川省主席的事件起到解放前夕彭县起义止，中间经历了一系列的反蒋斗争，我始终是联合他们在一起来进行的。

在团结西南实力派的活动，我所注意的另一个重点是云南。因为云南在地理上与川康接壤，而龙云在政治上的处境又和我大体相似，所以我特别重视同龙的合作。本来，我同龙过去的关系是不够好的，如一九二九年我支持胡若愚打回昆明，就是去拆龙云的台的。为此，多年来彼此都耿耿在心。但是蒋介石的压迫，却给我们勾销了夙怨，成为反蒋斗争的合作者。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龙云到汉口去见蒋介石，来去都路过成都，我和邓锡侯、潘文华等趁机同龙商讨了川、滇、康三省联合反蒋问题，大家意见一致，还签订了一个协定，内容大要如下：（一）一致拥护抗战国策；（二）如有违反抗战国策者，即为川、滇、康三省之公敌，共同反对之；（三）为确保抗战国策之实现，三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须实行合作，关于合作具体办法另行派员商定。龙、邓、潘和我都在协定上签了字。在签订这个协定的过程中，因王缙绪一度参与商议，不久他就向蒋介石告密，蒋曾电龙警告，不要他干与川康事。但是龙还是坚守约言，未为所动。为了保持机密，以后即同我单独联系。龙曾派他的总参议李雁宾到雅安同我商讨具体合作办法。当时成立了一个君子协定，因我先同共产党有联系，政治上由我负责，军事上则因龙拥有较大的优势，由他负责。同时还由龙和我投资筹设正成商行，想通过这个企业来实现经济上的合作（后因恶性通货膨胀和人事安排不

善未搞成功)。共产党对我和龙云的合作很关怀,华岗曾由昆明到雅安住了一个时期,同我几度长谈,主要就是为了密切我和龙的关系。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我同龙一直是紧密合作的。记得一九四四年冬季日本侵略军一度打到贵州独山,整个西南为之震动,龙曾来电征询我的意见,我即约集“唯民社”(我和一些进步人士在抗日战争时组织的秘密政治团体,详第四节)的一些朋友研究了一番,答复龙:如果敌人继续西侵滇康,我们要动员地方力量抗战到底,万一抵不住,上山打游击,决不能有任何动摇。龙云复电表示同意,并各自在滇康两省作了一些动员抗战的准备工作。到一九四五年十月,龙云在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下离开云南被软禁起来,我们的合作关系才被迫中止了。蒋介石在解决龙云的前一天,悄悄地来到了西昌。接着就给我打来了一个电报,说什么“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政通人和,不胜欣羨”等等。这样突如其来,我以为他要在西康搞什么名堂了。到十月三日深夜,王少春跑来告诉我,说刚从电台收到消息,蒋介石已命杜聿明在昆明出动武力解决了龙云。这时我才知道蒋来此的企图:一来是便于就近指挥昆明军事解决龙云;二来是给我颜色看,怕我对昆明事变表示声援。他向我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则等于警告我:“这回我不整你,以后你得当心。”这确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此后我对蒋的警惕就更加提高了。

西南实力派的团结,为反蒋斗争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随之而长期化和尖锐化,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年到头几无宁日。现在,仅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蒋介石集团斗争的重要事实略举如下:

对张群的拒绝和利用 一九三八年春刘湘病故，蒋介石认为是拿下四川的大好机会，便马上向我们打出了两张牌：一是撤销川康绥靖公署；二是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这是抗日战争发生后，蒋介石图谋控制川康的首次尝试。消息传来，引起了川康军政界的强烈反应，刘湘高级幕僚张斯可立即找我驻蓉代表段升阶，要我快从雅安到成都来筹商对策。时邓锡侯尚在前线抗战，我同潘文华和刘湘部下的其他几个将领会商，都认为这么一来，军权政权都给抓走了，四川就成了姓蒋的，没有我们的话说了，决不能答应。同时还估计到，正在全民抗战期间，蒋无力也不敢对四川用兵，只要我们一致反对，他就没有办法。于是决定向蒋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保留川康绥靖公署；拒绝张群来主川政。在我们坚决反对下，蒋被迫改变了主意，向我们讨价还价：一面答应保留绥署，以邓锡侯任绥靖主任；一面又要求在不更动省府委员和各厅处长人员的条件下，派张群独自一人来接省主席。我们认为这是诱鱼上钩，只要张一插足进来，四川局面迟早要为蒋所控制，所以还是不让步。蒋见计不得售，便自我转圜，改派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由四川将领自推一人暂代省主席，才了此一桩公案。一九三九年，蒋又旧事重提，要张群继王缙绪为四川省主席，我们再给顶回去，蒋无可奈何，只有亲自来兼领，而由贺国光以省府秘书长身份代行其职权，这样又闹了一年多，中间经过许多周折，到一九四〇年冬张群才坐上四川省主席这把交椅。张群本来是蒋介石的亲信，一切听命于蒋，始终为蒋效忠。但因鉴于川康地方力量不好对付，如果操之过急即可能发生事变，于蒋于他本人均属不利。同时他和 CC，复兴为了争权夺利，一向积不相能，又要倚川康地方力量以自重，所以他对我

们不能不敷衍几分。我们就抓住他的这种矛盾，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我们对张群的态度前后有所不同，即：在他未来之前是坚决拒绝，既来之后则是互相利用。在互相利用之中，彼此间的斗争也是极其尖锐和复杂的。我们对付张群的办法是：一面防止他代蒋图川，在无关大体的事情上可以适当让步，如果涉及川康地方全局和自身政治得失的问题即坚决拒绝，绝不上他的当；一面利用他的关系，在我们和蒋的对立状态中起一些缓冲乃至掩护的作用，来保持我们在川康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权力。张群之为人，主意很多。他对我们的态度，往往是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当形势于蒋有利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显得强硬；反之，蒋若处于逆境，他又以温和的姿态出现，向我们表示妥协。我们同他打交道时也是经常掌握政治寒暑表，根据不同的气候作不同的因应，有刚有柔，有攻有守。彼此之间长期围绕对川康的控制与反控制这个中心问题作文章。这种又反对、又利用的关系，前后维持了将近十年之久。

赶王缙绪下台 一九三八年我们头一次反对张群任四川省主席时，继任人选，原来推的是潘文华。当时潘因体弱多病，不胜繁剧，力辞不就。同时鉴于王缙绪平日之为人，利欲熏心，反复无常，怕他出卖地方倒向蒋那一边去，乃将省主席职位给他，使之安心跟着我们走。谁知此人本性难移，一经与蒋挂钩即被收买，把我们的反蒋内幕通通向蒋告密；任省主席后的所行所为，又复处处与我们对立，充当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我们当然不能容忍。我乃和邓锡侯、潘文华商定，发动我们下面的七个师长彭光汉、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陈兰亭、刘元塘、杨西轩联名发出电报，历举王缙绪十大罪状，要蒋撤去其省主席职。尤恐

仅此不行，还调了一部分军队集结在成都城郊，剑拔弩张，准备动武。蒋看到这个势头，知众怒难犯，不得不让步，于是王缙绪就被赶走了。

以武力解决曾鲁 一九三九年蒋介石派曾鲁到西康，利用雅安团管区司令的职权，与雅属各县及名山地区的土匪恶霸勾结起来，委以官职，贿以金钱，大肆招兵买马，准备把一群流氓土匪收集起来成立一个志愿师，企图利用这一武力来控制西康。由于有蒋在后台给官给钱，进展非常迅速，到一九四一年春间，即已凑成了两个团。我看出了苗头，便趁其尚未发给武器时，来一个“先斩后奏”，派两团兵将其包围，强迫解散。事后电蒋，告以曾鲁违反“兵役法”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已予紧急处置，请其“察照备案”。蒋看到“木已成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乃电复“准如所请”，并把曾鲁调走了。

抗拒蒋家军开进西康 一九四二年蒋介石借口西藏地方的亲英势力拒绝修筑康藏公路，命令我二十四军出兵讨伐，另派两师中央军进康接防；实际上，是借图藏以图康，要把我的部队消灭于康藏高原，而以蒋的嫡系部队来控制西康。我将计就计，立即慨然表示接受这个任务，并拟订了一个对藏军事计划，提出了对藏用兵的三易三难：前方作战易，后方勤务难；速战速决易，苦战求胜难；军事解决易，政治收拾难。依据这个计划开了一个账单，向蒋要枪械，要装备，要经费，要物资，要扩大编制，要补充实力；并派当时二十四军的参谋长伍培英住在重庆坐催，以促其实现。这样一来，那个主张对藏用兵的倡导者反而不来气了。我为此和蒋纠缠了大半年，最后由何应钦出面，说“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经费，对藏用兵暂缓进行”，此事才收场；从

而蒋介石的借图藏以图康的计谋也就破产了。

阻止军统武装力量进入西康 一九四二年蒋介石在西康设立了一个经济检查处，以军统大特务罗国熹任处长。名为经济检查，实际上是布置军统力量，要把西康置于其特务控制之下。只因西康军警力量都为我所掌握，罗未直接控制武力，不能为所欲为。故几年来，西康地方秩序尚称正常，一些进步人士在雅安自由来去，特务不敢加以迫害。蒋对此极为不满，乃于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派遣伪中央军一个旅，由罗国熹率领进入西康。我接到情报后，立即派兵两团集结于邛崃地区，阻止其进入康境。当罗的先头部队进到邛崃县以东的羊场，即给以迎头痛击。同时发动地方人士电蒋反对，并举行群众示威，闹得满城风雨。时抗日战争尚在进行，蒋不敢在后方扩大事态，被迫将其部队中途撤回。因此，西康地方秩序始终保持正常，没有变成蒋帮特务的恐怖世界。

反对蒋的整军阴谋 整军是蒋介石用以消灭杂牌军的主要手段。抗日战争胜利后，整个蒋管区普遍实行，企图在整军的幌子下将所有的地方武力一网打尽。蒋对我所率领的部队自然不会放过。一九四六年七月，他正式向我下命令，要将二十四军改为整编师。在当时的气候下，我不好正面反对，乃给他一个“阳奉阴违”。表面上依照他的命令，把二十四军改编为整编二十四师，以副军长刘元瑄为师长，应付一下场面；实际上仍是原封未动，二十四军还是由我统率，而且对内对外连名义都没有改变，可以说是：改编由他改编，军队我自带之。蒋明知故昧，曾向刘元瑄发过多次命令，要他开赴前线参加内战。我们则屡次以西康边防重要、兵力分散、不能抽调为理由，予以搪塞。故整个解

放战争期中，我二十四军始终没有抽调一兵一卒去参加反革命的内战。后来蒋见计不得逞，只得承认事实，仍然恢复了二十四军的番号。

击破“调虎离山”的诡计 一九四六年春，即蒋介石回南京之前不久，他叫张群向我转达，要我丢掉枪杆要政治，丢开地方到中央，去作伪中央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我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蒋惯于用此，过去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就是因为上了这个圈套而被整垮的。我向张坚决表示，宁愿到乡下去作老百姓，决不愿到南京去作“一品京官”。蒋看到我的态度这样坚决，其计不能得售，以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以上是我从国民党内部进行反蒋斗争的一部分事实，另外还有一些事实，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起见，连同解放战争时期的这类事实，在后面第五节叙述。

四、投入民主运动的洪流

自从武汉沦陷以后，蒋介石反动集团便疯狂地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一方面对解放区进行军事挑衅和经济封锁，同时在大后方进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无余。共产党和毛主席及时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而斗争。于此，一个波澜壮阔的反投降、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在西南大后方兴起了。这种政治形势的出现，我认为对我们地方实力派非常有利：第一，蒋介石窃踞中枢，居高临下，我们和他作斗争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如果参加民主运动，就可由防御转为进攻，变被动

为主动；第二，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受到民主运动的冲击，穷于应付，那么，他施加于我们地方实力派的压力也就可以大为减轻。因此，我就积极地投入了民主运动的洪流。

我在民主运动中的实际活动，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

(一)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 我同民盟的历史关系是比较早的。一九四一年，国内几个政治派别在重庆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张澜为主席。在酝酿期间，张澜几度和我商量，希望川康军政界负责的朋友能与之合作。时我正联合西南实力派从事反蒋活动，政治上需要有同情的声援，同时我和这几个政治派别的首脑人物早有联系，同张澜本人更有多年交谊，故张一提，我便满口答应，表示愿意在政治上互相配合，并在经济上尽力协助。民盟成立后，我就是按照这约言履行的。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同民盟并无组织关系。约莫是一九四四年冬，张澜向我说：“现在，抗战形势更艰巨，反蒋斗争也更尖锐，你老在盟外不好，应该站进来。”我同意他的意见，不久，便和潘文华一道，在成都慈惠堂街张澜的住所，填写了入盟申请书（张考虑到我同潘的特殊处境，接到申请书即当面焚毁），至此，我才成为民盟的正式成员。一九四五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内部发生了政治分化，民社、青年两党投入了反动阵营，民主同盟成为独立的民主党派，张澜仍被推为主席，我亦被选为中委（不公开）。为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我对外始终是以同情者的面貌出现，同民盟的政治关系和组织关系主要是通过同张澜的个别联系去体现。其中有足述者：关于国内各个时期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川康地方的各种重要问题，我同张澜经常交换意见，采取一致的态度，后来张澜离开四川到了上海，仍然通过

我的代表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民盟在川康地区的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我尽可能地在各方面予以便利和支持。在蒋介石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下,民盟的一些同志经常受到迫害,我利用自己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一切条件予以掩护,如一九四七年四川民盟组织被迫停止活动,成渝两地民盟的一些负责同志转移到雅安继续坚持斗争;一九四九年张澜在上海逃出特务的包围安全地进入解放区;以及西康康属、宁属等地区一些民盟同志在特务的压迫下长期坚持活动,等等,我在其中都尽了一定的努力。张澜为进行政治活动所需的经费,我给予了长期的支援(据我所知,四川朋友中潘文华有一个时期对张澜的政治活动亦有所资助)。以上这些活动,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时才告停止。

(二)主持民革的川康地下组织 抗日战争期间,我同国民党民主派首脑人物李济深、冯玉祥等有过多会晤,曾就国内政治问题反复交换意见。我们都主张团结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力量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相约共同准备条件,待机行动。一九四六年五月间李、冯离开重庆之前,又在重庆聚兴诚银行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的人士除李、冯和我三人以外,还有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时值旧政协会议闭幕之后,大家分析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估计有两个可能的前途:一是政协成功,国共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上建设国家;一是蒋介石破坏政协协议,国共决裂,进行全国性的内战。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多数人主张:如果出现头一种局面,我们就必须积极参加联合政府,在地方政府负责的朋友则应率先发出通电表示拥护;如果出现后一种局面,我们就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

组织团体,展开反蒋斗争。后来国内政局的实际发展,是属于后一种局面,李济深则离开上海去香港,积极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准备成立民革,与中共配合展开全面的反蒋斗争。一九四六年冬,朱蕴山受李的委托曾到成都,就筹建民革组织的问题和我进行了洽商。一九四八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我被推为民革川康分会主任委员(在蒋管区化名杨宗文)。民革中央的这个通知和朱蕴山的信,系派专人由香港间道送至成都,历时数月始接到。经过一番筹备工作,民革川康分会乃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成立。接着就在四川展开活动(因西康为我所掌握无须开展组织活动)。活动的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展组织,以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对象;一是联系地方武力,以各县的保安团队和自卫武力为对象。因为四川各县武力甚多,我们想争取过来,以备迎接解放,而不让它落到反动派手中被用来破坏人民解放事业,故把工作重点放在联系地方武力这一方面,指定专人,分区进行:川南地区由李宗煌负责;川西地区由王蕴滋负责;川北十余县由蹇幼樵负责;至于川东地区则因有杨杰领导的民革组织进行活动,我们只是进行一般的联系。在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各县地方武力大多倾向我们,声势日大,使国民党反动派为之震动。因此,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发生“崇宁事变”,我们所联系的部分地方武力,由王蕴滋率领,与王陵基部的保安部队激战于崇宁地区,历两昼夜,卒以众寡不敌,退至雅安。王陵基曾以此为把柄,在国民党内部向我发动了疯狂的攻击。在“崇宁事变”发生后不久,李宗煌在成都为蒋帮特务所逮捕。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罪恶行动,事前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张群当天早上离成都飞重庆,特务跟着就行动,

在李被捕的第二天，西南的特务头子徐远举又跑到我家里向我说，李宗煌在四川进行“危害民国”的活动，他们把李逮捕了，本人已经承认了事实，问我如何处理？我知道他们搞这一手，是“杀鸡给猴子看”。因为我手中握有实力，奈何不得，故从下面动手，实际上矛头是指向我的。张之走是推作不知，向我留一回回旋余地；徐之来则是为了封口，使我不能出面去保。我明白他们的打算，所以这次对徐只说了一句话：“等张先生（群）回来再谈。”后来李宗煌被押解到重庆，几经营救无效，重庆解放前夕，竟被蒋帮特务杀害于渣滓洞，成为民主运动中的烈士，解放后受到了党和国家的优恤。经过这两次事变，川康民革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后来我们重新加以整理，决定组织活动以大城市为主，对地方武力的联系也改为以人为中心去进行活动。这样，就避免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摧残，仍然为川康地区的解放事业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

（三）支持知识界的进步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基础上，我同知识界的进步朋友，联系日益广泛，关系亦日益密切。一九四一年春，我和李相符、杨伯恺、黄宪章、马哲民等研究如何在后方民主运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大家都认为有成立一个秘密性的政治团体的必要。经过几度商量，决定成立“唯民社”。在成都邵石痴（是我与进步人士联系的代表）家开成立会，通过社的宗旨为“全民团结，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推选社委员会，由刘文辉为社长，李相符管组织，马哲民管宣传，邵石痴管财务；社的经费由刘文辉负责筹措。参加的社员有邓初民、杨伯恺、朱蕴山、沈志远、黄宪章等三十余人。“唯民社”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作去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先后

亦有《唯民周刊》、《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半月刊）、《民众时报》（日报）、《华西晚报》，分别由邓初民、沈志远、马哲民、李相符、杨伯恺、黄宪章主编，在成、渝两地出版，以揭露蒋政权的反动罪恶，推动后方民主运动，争取学术自由，团结进步青年，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此外，还在重庆办了“文治出版社”，在成都开了“大学书店”，以印刷和供应进步书刊。一九四五年十月民主同盟临全大会以后，我们认为，“唯民社”的宗旨已经包括在民盟的政治纲领内，同时该社的主要负责人又大都参加了民盟，并且有不少人被选为民盟中委或民盟四川省委，我们这个政治团体已无独立存在的必要，乃于这年年底停止了组织活动，所办的各种刊物和事业，或因受蒋政权的迫害或因各主要负责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陆续离开四川，亦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内相继停办或易地出版了。

一九四六年夏季，蒋介石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我受知识界的一些进步朋友的鼓励，又在成都创办了《西方日报》，以适应国内新的政治形势。为了便于向国民党政府立案，以我二十四军副军长刘元瑄任董事长名义，编辑部门则完全委诸进步朋友，而以陈落主持其事。这个报纸，因为是以中间偏左的姿态出现，创刊以后，蒋介石反动集团不断地进行捣乱，只因有我作后台，他们还得敷衍几分，所以在吵吵嚷嚷中坚持了三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胜利后，蒋政权已到总崩溃的前夜，这个报纸也进一步以左派的面貌出现。于是蒋的忠实走狗王陵基发疯了，竟令伪成都警备司令部实行暴力镇压，报纸被迫停刊，编辑部门的进步朋友亦大多秘密转移到雅安，改办小型报纸，去迎接解放。

直到解放，我才结束了在民主运动阶段参加的民盟和川康

地下民革的活动，而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之一，在党的领导下，为新的历史任务进行新的努力。

五、政治上的一守一攻

一九四九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声明向共产党求和，第二天张群从南京发来一电，约我赴京一谈。我正想去看看动静，乃于一月五日率我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桢一道飞南京。这时国民党政府各院部正忙于南窜广州，在京的军政大员已寥寥无几，城内一片兵慌马乱的景色。我到京后即去会张群，他正准备去武汉调节蒋桂冲突，叫我去先见蒋介石，我们改日再谈。第二天我就去会了蒋，他的神情显得很沉重却又故作镇静，向我说：“局势看来很严重，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家要乐观。”接着就谈到四川，说“四川是抗战胜利的发祥地，中央很重视，有了四川就有办法。如何布置，岳军（张群）会同你详谈。一切都好商量，希望四川朋友忠诚合作。”云云。这意思是说：“我特别关照你，再不要和我捣乱，将来给你甜头吃。”我心里当然明白，他是在兜售收买政策。在京期间，张群同我作了好几次长谈，他告诉我：“和谈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能不作万一的准备。蒋先生已决定集中兵力，扼江而守。”并说各大战区人事已经作了新的部署，调朱绍良回东南，华中仍交白健生，西南则新成立军政长官公署，叫他去负责。这，等于向我摊开了谜底：蒋的元旦声明是一个和平骗局，借此以争取时间，准备继续顽抗。最末一次，张群谈的更露骨，说“西南是最后的堡垒，四川又是西南的心脏；别的地方可以丢，四川不能丢；到必要时，中央将调百万大军来保卫四川。”我知道了这些，

总算不虚此一行。到京后第二天，我曾叫杨家桢去上海看张澜，问他对四川的作法有何意见？张说，时局两三个月后就有大变化，最后决战在四川，叫我快回去准备，好迎接解放。离南京前夕，白崇禧打来一个电话，说我道经武汉时，他希望同我谈谈；我料他所要谈的，不外联川、逼蒋、反共之类，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托辞拒绝了。我回川后，国防部已在川中各重要地区纷纷建立后勤机构，征集给养，准备设防。这说明张群向我透露的军事策划已开始变为行动。眼看革命与反革命最后的一次大搏斗，不久就要在这里出现。如何准备应付这场暴风雨，已经提到了我们的首要议程。我考虑到，蒋家军在人民解放军面前，是一个不堪一击的懦夫，但是对我们地方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彪形大汉。因此，我们在军事上不能单独同蒋较一日之长短，只能通过政治斗争，给他们制造种种障碍，使之在川康的政治控制和军事准备不能顺利实现。这样，我们才站得住脚，也才能对川康的人民解放事业起一些积极作用。同时我还考虑到，川康两省的情况不同，要求的作法亦应不同。西康为我所掌握，主要的要求是加强控制，巩固内部。四川政权则是由王陵基支配，必须给以打击，限制其行动，破坏其控制，使四川地方的力量，为我们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不是为敌人所利用。因此，我们的政治斗争应该是：对西康是防守；对四川是进攻；通过一守一攻的斗争，去加强自己，打击敌人。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我就依据这个想法，做了下面一些事情：

第一、加强对西康省的控制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头一步是在西康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分区管理，统一军政指挥，以适应新的形势。因为西康省区

面积有五十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比五个浙江省还要大,又是高原地区,经济落后,交通尤其困难。同时少数民族甚多,情况非常复杂。而蒋介石又长期有计划地在这里树植反动势力,制造民族矛盾,来和我捣乱,弄得事情更不好办。我从一九二九年任川康边防总指挥时,就开始在这里搞起,经过二十余年来的苦斗,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现在,暴风雨即将到来,决非老一套所能应付。因此,仍按照旧有的康、雅、宁三属把全省划分为三个管区,各区军事政治实行统一指挥,指派专人集中领导。以西康省政府代主席张为炯兼管康定区,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璋负责雅安,二十四军副军长伍培英负责西昌区。我要求他们在此期间,除处理一般军政工作外,按照各区实际情况,各自着重在政治上办好一件事情。

康定区: 是加强同藏族中上层人士的联系。藏族人民聚居于康属地区,他们占地最广(西康共辖四十七县,其中康属占三十三县,除金沙江以西十四县早为西藏地方亲英势力所实际控制外,实有十九县),在地理上同西藏毗连,在政治、经济、宗教上同拉萨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在历史上同汉族的纷争又最多。这是治理西康的关键问题。正因如此,所以蒋介石曾经在这方面给我制造的乱子也特别多。如:一九三五年的诺那事变,一九三九年的甘孜事变,等等(这种事变,情况复杂,须专文叙述),就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利用和制造汉藏民族矛盾,来打击我,限制我,削弱我,使我无法立足,以达到其控制西康的企图。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我乃根据历年来的经验教训,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鉴于宗教对藏族各个阶级的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搞好了宗教关系,同时也就搞好了同藏族的政治关系。因此,我把工作重点放在

这方面：曾召开僧伽大会，以团结各教派的高僧大德；成立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处理各教派间、寺庙间、僧俗间的纠纷；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以经济上的照顾。与此同时，还通过西藏的一些高僧大德的关系，同拉萨政教上中层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三大寺供养，并派人到拉萨留学（佛），借以加强政治联系。这样，就大大地缓和了西康汉藏民族间的矛盾，改善了西康省政府同藏族土司头人间的关系，从而蒋介石在这里利用民族矛盾和我捣乱的各种阴谋，也就没有得逞。但是蒋在这方面并没有死心，仍经常派遣特务在康属各地进行破坏活动，人民解放战争愈胜利，其破坏活动愈疯狂。因此，我决定把加强同藏族中上层人士的联系作为康定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除了认真执行原有的各项措施外，要与各喇嘛寺经常保持接触，随时向他们说明时局真相，消除蒋帮特务和西藏的帝国主义分子散布的毒素，使之始终跟着我们走，而不为反动派所利用。

雅安区：是加强地方力量的联系。雅属地区的特点是：土豪势力大，袍哥组织强，民间武器多，一个县的大恶霸一呼而可以聚众数千人进行武装叛乱。蒋介石看中了这一点，从而加以庇护、扶植、利用，来和我捣乱。一九四六年的天（全）、芦（山）、荥（经）事件，即为显著的实例。这次事件的大略是：一九四五年冬，伪中央派覃维球率领禁烟督察团来雅安，装腔作势，好象真要厉行烟禁。当我于一九四六年春派兵实行铲烟时，蒋介石却又唆使西康籍的中央军校学生朱世正等在荥经、天全等地区进行武装反抗，以致我第一区保安司令张律宾阵亡。我为贯彻烟禁，保持地方秩序，对这种反抗坚决予以镇压。蒋介石看到他所

扶植的这股恶势力遭到了失败，又派遣特务朱静泉进一步策动“倒刘运动”。他们一面发动国内各地的御用报纸，对我大肆诽谤，把地方恶霸的反抗烟禁说成是“西康民变”，并在一九四六年乘我参加伪国大会议时，纠集一群人在南京表演了一幕请愿游行的丑剧。一面由西昌行辕在重庆秘密运来大批武器(据调查有捷克式轻机枪五十挺、步枪一千枝、子弹五万发)给天、芦、荣等县地方恶霸补充实力。经过半年的阴谋活动，朱世正、朱静泉等竟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在“西康民变”的幌子下，纠集天全的李元亨、陈步胜，芦山的陈志武，宝兴的杨朝明等恶霸，率众五千余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一度攻陷天全、芦山两座县城，进迫雅安。这时南京的许多御用报纸，莫不为“西康民变”的胜利而喝采。我为保持西康的正常秩序，适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经过一个月的扫荡，叛乱即被平息。蒋介石反动派这次策动的“倒刘运动”遂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批地方恶霸，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庇护，仍然潜伏在地方继续为恶。如果时局一有变化，他们必然乘机蠢动，与蒋介石反动势力里应外合，实为西康省迎接解放的一大隐患。我有鉴于此，乃采取如下预防措施：(一)紧紧掌握省参议会和各县参议会，依靠其中有声望的公正人士，把地方力量控制住；(二)配置保安力量，监视这些恶霸的行动，一遇事态发生，立即予以制裁；(三)指派专人同这些恶霸分子保持接触，晓以利害，经常给他们敲警钟，使之不敢妄动。我叫雅安区的军政机关在这个阶段，用大部分精力来办这件事。后来民盟有几个同志也在这里做了一些工作，在这些恶势力中起了一些分化作用。

西昌区：是加强对西昌警备部的斗争。西昌地区旧称宁属，

为彝族人民聚居之地，民族矛盾最尖锐，同时又与云南毗连，两省地方力量便于互相支援，因此，蒋介石看中了这个地区。一九三九年西康建省后，蒋紧接着就在这里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以张笃伦为主任。抗战胜利后，张去，贺国光继其事，改称“西昌警备司令部”，名异而实同。蒋之设立此机构，主要为的是控制西康，监视云南，换言之，就是监视我和龙云的行动。我跟着也在这里设立了一个“西康省屯垦委员会”，由我身兼委员长，与之相对抗。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九年这十年间，这两个对立的机构，几乎无日不在紧张斗争中。蒋在西康给我制造的许多大乱子，大多是西昌行辕参与策划和支持的。而每一次事变，我都付出了许多力气才把它对付下来。我们同西昌行辕在西昌区当地的斗争尤其激烈。斗争的主要对象是争取地方力量。因为这里的彝汉首领大都拥有武力，在当时的条件下，谁掌握了这些首领，谁就能控制这里的局势。所以彼此都尽力争取。为了争取当时彝族中实力最大的西昌靖边司令邓秀廷，我曾亲自到邓家作客，“移樽就教”，把关系搞得很好。但是张笃伦并不肯放手，等邓死后，其老婆袭其位，他即于一九四五年同她订了儿女亲家，企图把这个力量拉过去。由于我早已将邓部掌握实权的夷务指挥孙子文、邓德亮等争取过来，以此未能得逞。后来西昌警备部又要派兵攻打邓德亮部，我即站出来说话，使之不敢下手。这样的争夺战，在西昌整个地区，经年累月，此落彼起，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我在这里的工作早有基础，一直没有放松，所以尽管蒋介石反动派拚命同我捣乱，这里的地方力量绝大部分仍然掌握在我手中。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我知道蒋军将大举西窜，这里在军事上的地位更重要，乃命伍培英长期驻此，统

一军政领导，紧紧掌握地方力量，同时在政治上向西昌警备部展开全面进攻，尽量给以打击，以削弱乃至取消其作用，确保我们对西昌地区的控制权。从1949年春季以后，我们同西昌警备区的斗争，成了一个短兵相接的局面。比如：警备部在西昌城内贴出的标语是：“拥护蒋委员长戡乱救国”，我们贴出的标语则是“人民为第一，一切为人民”，形成鲜明的对照。警备部要管制花纱布，我们就支持商人的营业自由，警备部与中央银行勾结，要将存储在西昌的银币和生银二十万两用飞机运往重庆，我们就根据工商界的要求组织民众武装阻挡，结果花纱布还是自由买卖，白银也没有运走，从而西昌的工商业者也更加倾向于我们。伪警备部为了收买人心，发起募捐救济安宁河水灾，我们就拨出一批大米去赈灾，灾民受惠更大，同时还派兵协助群众兴修城西河水利工程和市区道路，因此，我们军队同当地人民的关系也有所改善。这种斗争，一直坚持到我军撤出西昌时为止。

第二、加紧推动四川的反蒋活动

我把西康省的工作布置好了以后，交给几个负责干部分头去执行，自己就跟着到成都联合邓锡侯、潘文华等，在四川展开活动。我们把矛头直接指向王陵基，以伪四川省参议会为工具，把地方当权派中可以利用的力量充分利用起来，向王陵基发动政治进攻，由反王以反蒋。其主要事实如下：

反对王陵基作四川省主席 一九四八年四月，蒋介石派王陵基继邓锡侯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原是刘湘部下的师长，刘湘死后投靠蒋介石，成为蒋王朝的忠实奴仆。他在政治上最顽固，性情又极乖戾，四川人称之为“老乱”。这次回川主持省政，

气焰更高，一切唯蒋之命是听，对地方力量概不卖账，接任半年，闹得天怒人怨。我和邓、潘等商量，决定策动一个“驱王运动”，把他赶下台去。我们采取的策略，是驱王拥张（群）。张和王其实都代表蒋，我们所以这样做：一是制造人事纷更，使四川政局动荡不安；二是扩大张、王个人相互间固有矛盾；三是即是王赶不走，也可以打击其拥蒋反共的气焰。这就可以削弱乃至破坏蒋对四川的政治控制，而有利于巩固自己和迎接解放。因此，我和邓、潘联合熊克武等一起，向张表示好感，拥护他重主川政，我们愿作省府委员。张因自己另有打算，表示愿向蒋进言。于是我们于一九四九年六月，策动省参议会，联合川、康、渝部分伪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和康、渝部分参议员，组织联谊会，以熊克武任联谊会主席，公开反对王陵基，推派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撤职查办。蒋不答应，我们又策动省参议会以不通过伪中央的征实征借案相要挟。蒋着慌了，乃于九月初在重庆约我和邓锡侯、向传义（四川省参议会议长）等进行疏通，要求对征实征借案予以支持。我们坚持王一天不去，案就一天不能通过。蒋此时被迫承认了，后来又翻悔了。因此，更加激起了地方人士的愤怒，从而川中驱王的声势也就更大了。

争夺对省参议会的控制权 国民党统治下的省、县参议会，是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重要政争工具之一，各方面都想控制，用来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当一九四五年四川省参议会成立时，我即和邓锡侯、潘文华等同 CC、复兴两个反动派系进行了一次争夺战，把同我们有关系的向传义、唐昭明选出来作正副议长，从而省参议会在各种重大问题上都是跟着我们走，曾给蒋介石在四川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榨取增加了不少困难。故蒋想方设计

要改变这个局面。一九四八年蒋用行政命令，把民社、青年两个反动党派的分子派进来，在省参议会占据二十八个议席。他来这一手，一则是为了在政治上拉拢民、青两党，同时要在议席上凑成多数，以取得省参议会的控制权。为此，曾经引起大多数省参议员的剧烈反对。后来蒋用四名伪立委名额作交换，虽然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他所期望的多数远未凑成，局面仍未改变。一九四九年春，因唐昭明被选为立委，副议长出缺，蒋又抓住这个机会，指使四川的CC、复兴组织联合起来，支持顽固分子陈紫舆来竞选副议长。我们当然不肯让手，即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川北何宗杰竞选，结果陈紫舆失败了，我们所支持的何宗杰当了选，从而蒋介石反动集团第二次夺取参议会控制权的阴谋又破产了。

反对田赋征实和巴山设防 一九四九年春，我们在争夺省参议会控制权成功后，接着就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省参议会第六次会议上向王陵基发动进攻。在省府提出的施政计划中，抓住两个要害去打击他。第一是反对田赋征实：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川田赋定为年征黄谷九百万市石，伪中央从中提取三成，为二百七十万市石，此外又按征实额借九百万市石，合计为一千一百七十万市石。每年由省府提经省参议会通过后执行。这次王陵基循例提出这一案，我们组织反对，坚决不予通过。这是一箭双雕：一来可以在财政上致王于死命，因为在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省府如果不掌握实物，仅凭一堆不值钱的法币就不能维持局面。二来是抓住这个重要环节去打击蒋介石，因为伪中央的提成和征借都是以田赋征实为前提的；如果征实案被否决了，那么，蒋就不可能再在四川掠夺这一大笔财富。这一案，由于我们组织反对，搁置了大半年未解决。后来蒋亲自出马，经

过几许周折,虽然形式上予以通过,但是为时不久人民解放军即开始向西南进军,实际上并未得到全面的执行。第二是反对在大巴山设防:王陵基这次是打着反共的旗号回到四川的,同固有的地方力量,特别是同我的关系,形同水火。但因他手中实力有限,造不起大乱子,所以他终日叫嚷要扩充军队,来作看家的本钱。我们时时提防这一着,不让他实现。这次,他竟向省参议会提案,要求将伪中央准备偿还四川人民的借款(每年还谷二百万市石,折合美金二百万元)拨给他,购买武器装备,新成立二十个保安团,准备在大巴山设防,以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我们闻知其事,早就在省参议会内作了布置。当这一案交付讨论时,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对;王还不识相,在会上喋喋不休,参议员罗承烈等当场严词驳斥,说:“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抵不住共产党,你搞这一点队伍有啥用,四川老百姓的钱决不得给你去打仗。”骂得王面红耳赤。一阵反对声,这一案遂被否决。

策动民众自卫运动 这是一个变相的保境安民运动。鉴于蒋介石正以四川为中心积极布置反共军事,准备在西南作孤注的一掷,而王陵基又为虎作伥,形势日紧。我乃同邓锡侯、潘文华商量,在四川搞一个民众自卫运动,来捆住王陵基的手脚,从而牵制蒋在四川的军事行动。邓、潘都不满意王陵基的刚愎自用,故表示同意。继而又征询熊克武、向传义等,他们也不直王之为,赞同其事。但是,这是要大张旗鼓来干的,非设法取得张群的同意不可。因此,主意打定后,我就与向传义商量由他在省参议会内先行酝酿,接着又同邓锡侯、熊克武等到重庆去找张群,以王陵基不得人心,不能应付“事变”为理由,主张把四川组训民众的工作从省府划出来,另建组织来管。张群因与王个人

之间有矛盾(王陵基、杨森对张都不听命),想把地方力量掌握到自己手里,同时借以拉拢我们,同意了 this 主张。恰值川、康、渝三地伪国大代表,立、监委员和参议员友谊会在重庆开会,为了扩大政治声势,我们就派人串通他们,将该友谊会改组为以四川省参议会为中心的川康渝民意机关友谊会,来开展四川的民众自卫运动。这个组织的成分本来是非常复杂的,但因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各人在政治上都得有一个打算,所以他们也就怀着不同的动机参与了这一运动。六月底在成都开成立会,张群也以伪国大代表身分参加了。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政治自治、经济自给、武力自卫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成立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来执行三个省市(实际上只是四川)的组训民众任务。委员会由向传义、胡恭先、范众渠(川康渝参议会议长)、卢子鹤、夏仲实等三十余人组成。为了使这个组织在政治上带上超然的色彩,推熊克武为主任委员,幕后由我商同邓、潘等规划其事。为了防止王陵基的捣乱,我们并找着张群,在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完成了立案和加聘手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紧接着就在成都建立机构,发表宣言,展开工作。宣言上只说保卫川康渝的安宁秩序,在国共之间是以第三者自居。四川老百姓一听到不让蒋介石在四川打仗,皆大欢喜,街谈巷议,声势颇大。王陵基看到着慌了,乃抓住宣言作把柄,向蒋告密,说自卫委员会态度暧昧,连“剿匪”、“戡乱”的字眼都没有,显然与共产党有勾结。这时张群也改变态度,不予支持。蒋就通过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以“于法无据”四字的罪名,严令取缔,自卫委员会才被迫停止公开活动。

我同邓、潘等搞上面这些活动,是直接反王,间接反蒋。归

根结柢，还在于争取地方力量，不仅要争取散在乡间成千成万的人枪听我们呼唤，而且要争取地方上的实力分子基本上跟着我们走。我们认为，只要有了这个本钱，就可以威胁蒋介石，使之不敢吃我们。我们的事情远没有做成功，但已使蒋意识到，“恶龙难斗地头蛇”，惟恐地方出乱子，不好对付。所以我们长期耽在王陵基暴力控制下的成都进行反蒋斗争，而蒋始终不敢向我们下毒手，我认为原因就在这里。

六、彭县起义前后

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间，西北的西宁、银川和南方的广州相继解放，战争重心已开始转移到西南，蒋介石亲自跑到重庆指挥军事；宋希濂、罗广文、郭汝瑰等部向川东、南集结，胡宗南部则向川北集结，企图抗拒人民解放军解放川康。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周恩来一个电报，大意说，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等语。我体会这个电报的精神，是叫我们保存自己，迎接解放。因此，我就抓紧时间，将西康省的军事、政治重新作了部署以后，于十月下旬率必要的工作人员到了成都，并决定长期住在这里，去对付这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当时有的朋友替我担心，认为置身虎穴，凶多吉少。我考虑到，耽在这里，利多于害，危而实安。因为：（一）对于四川地方反蒋力量的联合，欲其在紧急关头不致因蒋的威胁利诱而动摇，有待于继续不断的巩固。（二）成都是四川的政治中心，也是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斗争的中心，我耽在这里，既便于同民主力量和地方力量联系，又可以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内部进行分化

运用。(三)在军事上蒋对我处于绝对优势,我一人在成都,蒋对我的政治态度摸不透,就不至对我用兵,而我能多拖一天,人民解放军就接近一天,遭受敌人的军事威胁也就少一天;如果先行露出可疑的迹象,引起敌人的警觉,胡宗南的重兵向西康一压,我就吃不消,自己实力既不保,那末,迎接解放也就失所凭依;我以为周恩来上述指示的精神,也正在这里。基于以上原因,所以我下定决心,处在敌人的暴力控制下去同敌人作斗争。

我这次到成都的活动,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是建立组织,以我和邓锡侯、潘文华为核心,约集熊克武、邓汉祥等人参加。每天在我家里聚会,主要是交换情况,筹商应付事变的对策。为了解蒋介石反动集团内部的动态,有时也找王缙绪参加。此人是惯于出卖朋友的,我们对他早有戒心,只是加以利用,并不让他知道真的一套。其次,是联系民主力量和地方力量。对于前者着重在民主党派,如四川民盟和民革的某些同志,在这一时期都同我有密切联系,为以后的起义进行了政治准备。对于后者则着重在四川省参议会,抓住其中一批有力分子为纽带,与各县地方力量紧密联系起来。再其次,是对付国民党反动派,我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对王陵基是硬来,一点不妥协。对于来自伪中央的“达官贵人”,则送往迎来,把酒言欢,一如往昔,使他们觉得我仍然是同路人,肯说实话。比如我和邓锡侯、潘文华、吕汉群等去会阎锡山时,他就向我们说,“你们到台湾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他这一说,就给我们发出了危险的讯号——蒋介石要把我们劫持到台湾去。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早作戒备,没有上当。

这一时期我在成都,还要同蒋介石的特务作斗争。当我来成都不久,我的玉沙街住宅的对门即出现了一连宪兵,四周布有

大批的便衣特务，甚至把特务派进我家里作佣人。大特务徐远举经常在靠近我住宅旁面方正街的一座神秘的建筑里进出，来指挥特务活动，我每天出入都有无数双贼眼盯着。我早已料到会有这一手，故先就采取了保卫措施，调了两连卫兵驻在我住宅内，在周围安了便衣队，并暗中将附近几条街道的民众自卫队武装起来，与蒋介石的宪兵、特务相对峙，随时准备进行巷战。同时我的日常生活，一切保持常态，家里的一针一线都不搬动，没有显示出任何令人疑异的迹象。就这样，居然把这群吃人的豺狼对付过去了，在那些严重的日子里，他们始终没有敢奈何我。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仓惶逃到成都，我们同蒋介石反动派的最后一场激烈斗争开始了。我们早知道蒋在川东必不能守，下一步就会率领其残兵败将窜川西。事到临头，应当如何对付？我们事前就作了一番研究，认为：同恶魔斗法，必须把国民党固有的那一套勾心斗角的技巧高度地发挥起来，一点也老实不得。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投向人民，迎接解放。但是对此时此地的敌人，在方法上又需得虚与委蛇，相机运用。所以我们商定对蒋的策略，是抽象的敷衍，具体的抵制。在敷衍时，装蒜要装得象；当蒋向我们提出具体要求时，能推则推，不能推就拖。看形势，撑得住就撑，撑不住就走。现在，预料的这一天已经到来了，我们就开始运用上面这套策略与蒋介石反动派相周旋。

蒋介石到成都的当天下午三时，就在北较场军校召集张群、邓锡侯、熊克武、向传义、王陵基、王缙绪和我等谈话。蒋首先谈了川东作战经过和这次撤退的部署。故意渲染，听来好象他是作有计划战略转移。蒋接着又吹嘘川西大会战的形势和条件

如何好，并把希望寄托于胡宗南部，说这个兵团还是完整的，尚可一战，希望川康方面的朋友与之合作。意在骗取人们的信心，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为自欺欺人。最后他向我们征询意见，看这一仗如何打好？连续有好几个人表示了意见，有的主张不战而退康滇边境，有的主张在川康边境山地作战，王陵基则主张在川西平原决战。在这种场合，我不能不来一个“抽象的敷衍”，我说：“委员长总揽全局，我们都是一偏之见，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蒋听了接连点头称好。并即嘱咐张群，要他同我们再从长计议。十二月二日午后张群就到我玉沙街住所来会我，我跟着打电话把邓汉祥约来，三人一起谈。张首先提出四个问题来征询我和邓的意见：（一）蒋介石应否复总统职；（二）王陵基撤换后由谁继任；（三）川西大会战应如何部署；（四）我和邓锡侯两部在大会战中如何和胡宗南部配合。张一谈我即知其用心，主要的是叫我亮底，前面的三点只是陪衬而已。我推邓汉祥先谈，自己趁时思考了一番，觉得需要若即若离，让他摸不透。邓话毕，我即接着说：“蒋先生复职和王陵基去留的问题，刚才鸣谱（邓汉祥号）谈得对，我都同意。我认为，当前要紧的是军事，仗打不赢，一切皆空。今天全靠胡宗南这张‘王牌’，别的都抵不了事。”我借此机会发了几句牢骚：“蒋先生过去对待杂牌军的办法是，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事到如今，我们实在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至此，我又把话转过来，“今天到了这个光景，但有一兵一卒，也得同共产党拚。”紧接着又拖了一个尾巴：“你知道，二十四军散处在康、宁、雅三属，纵横数千里，翻山越岭，徒步行军，非有一两个月集中不起来，怕的是远水难救近火。”故意显示出我的“心余力绌”的矛盾心情。扯了大半天，无结果而散。

张群的第一次试探，没有得到要领，第二天他又通过邓汉祥向我们提出了两条：（一）是要我同邓锡侯和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二）是要我和邓锡侯的家眷同熊克武、向传义、邓汉祥等先去台湾。一望而知，这是要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并且提供人质，来胁迫我们一同去反共反人民。我当夜就约集邓锡侯、熊克武、邓汉祥等商量，决定用一推二拖的办法去抵制：关于家眷问题，用各种托词推却，坚决不去台湾；关于同胡合署办公问题，则口头上答应，实际上不履行，拖下去再说。商量好了，四日上午仍由邓汉祥去转告张群。张听了很不高兴，并且特别“照看”我，向邓说“刘自乾太太不能去，那就叫他儿子去。”到了晚间，伪财政部长关吉玉又到我家向我说：“据说你要送家眷到台湾去，恐怕没有外汇，我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取用。”我此时向关敷衍了一番：“感谢你的好意，让我考虑一下再商量。”这时我已意识到，蒋对我的压迫正一步紧似一步，可能明天还会有更严重的场面出现。不过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打定了主意，“任他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因三天来经过张群向我们出的难题，都给搪塞过去了，觉得软的不成，于是来硬的一套。五日午后3时张群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商，约我到励志社去。我预感到有闹僵的可能，乃邀邓汉祥一道，以便有回旋余地。当我一进张的办公室，立刻觉察出他面有怒容，一改平日神情。刚坐下，他劈头一句就问：“刘自乾，你究竟打的什么主意？”我感到情况严重，必须认真对付才行，马上就把早就编好了的那套拿出来：“我的主意本来早就打定了，要同共产党拚，万一拚不过，就在西康当喇嘛。近日听说共产党军队已从玉树西进，看来这条路也走不

通了，现在只有同共产党拚到底。”我说至此，办公桌上电话机的铃声响了。张忙着去接，对方说话的声音很细，只见张连声答应，“来了，来了”，跟着就把电话机搁下了。我判断这是蒋从北较场打来问我行踪的，这时我的情绪有些紧张了，但又不能不故作镇静。接着我反问张：“这几天东路的情况怎样？”张更凶了，厉声说：“你不要问东路西路的，问你自己怎么样？”两个人抵起牛来了。于此，邓汉祥出来打圆场。他向张说：“事情很简单，蒋先生要刘、邓两部如何作战，下命令就是了。如果周到一点，先请你约胡宗南、顾墨三和刘、邓商定作战计划，然后再请蒋先生下命令，那就更好。”张没有置答，就拿起电话机找胡宗南说话。看他的神气，很可能马上就要把我交给胡，以合署办公为名扣留起来。我以为这一下逃不脱了。可能是机会凑巧，这时胡恰去绵阳未归。于是张向我说：“等我和胡宗南约好时间再通知你们开会。”我听了如释重负，便和邓匆匆辞出。

我从励志社出来，就直接到邓锡侯家，研究第二个回合该如何打？当即商定了两点：一是开会地点必须在我玉沙街住宅。因为这里我有保卫措施，安全有保障。如果在别处，他们一开玩笑就只有束手待缚。二是态度必须尽量灵活，违心之言不妨多说，只要打发这群瘟神出了门，反正还得另打主意。跟着就托邓汉祥去请示张群，看开会地点可否定在我家里？张表示同意，并同胡宗南约好了，就在当晚七点，我还大办筵席来招待这一批值不得欢迎的客人。这晚到会的人有张群、顾祝同、胡宗南、萧毅肃、王陵基、王缙绪、邓锡侯和我（潘文华去灌县养病）。会场气氛十分紧张，舌剑唇枪，此来彼往，互不相让。萧毅肃首先向我们开炮：“据报邓晋公命所部集结广汉、新都一带，阻击胡宗南部西进；刘

自公的部队已经破坏了邛崃大桥，不许胡宗南部通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确在成都道上作了军事部署（见第七节《西康的阻击战》），并且决定炸毁邛崃大桥，使胡宗南匪部的重武器不能通过。但是还在准备阶段，尚未执行。因此，我们坚决否认，叫他们实地调查，我们愿具甘结。他们看到话说得这样硬，在这一点上也就再没有人开腔了。继而萧又拿出一张敌我作战态势图，指指捺捺，对其攻守策略大事吹嘘。这时顾祝同来征询我的意见：“自乾，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故意向他们发了一顿牢骚：“行是行，可惜我同邓晋康的部队在过去大部分被整掉了，假使今天还象当年一样，这个担子我们两个人都担得起。”胡宗南马上插嘴：“刘先生，你不要灰心，我的四十万军队交给你去指挥。”我接着就把胡的话打了回去：“我们都是行家，你的部队我哪里指挥得动？我的部队你也不能指挥。”大家胡扯了一阵，后来他们又把矛头指向我：“谈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出结论，刘自公你究竟打算怎么办？”我早就准备了他们会将这一军，答复得很干脆：“这还用得着我说明吗，事实摆得最明白，你们自己按^①也按得到，我又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样样占齐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要我。”张群听了十分高兴，把我的肩一拍，说：“自乾今晚说的是真心话”。他还带着满脸笑容向胡宗南道：“这回你该放心了吧”。就这样，结束了这场激烈的战斗。

六日这一天，算是狂风暴雨当中的间歇。白天无事，晚上张群到我家里来辞行。他平日来总是先打个电话，这次是突如其

^① “按”，四川话，估计的意思。

来，而且一直升堂入室，意在刺探动静。看来他尽管叫胡宗南放心，实际上他自己对我却是顶不放心的。这时我正在和锺体乾谈话，座上无别人，他见一切都无异状，也就心平气和的告诉我，明早飞昆明，一、二天内就转来。接着又以低沉的语调向我说：“形势是严重的。我们多年共事，希望你和晋康贯彻始终，共支危局。国家有办法，个人亦有办法。万一不成，要走将来我们一起走。”这显然是给我一副镇静剂。我想趁机从他身上测量一下蒋的气候：“胡（宗南）王（陵基）两位朋友，对我和晋康误解很深，你是我们的‘护身符’，有你在当然无问题，你走了，看他们是否可能开玩笑？”我向他这样说。张群硬打包票：“哪里有这种事，决不会，用不着怀疑。”临别时我还故意再三叮咛他早日转来，使之不疑有他。张走后，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蒋对待他的政敌，一向是用两套戏法，用一种人来笼络，一种人来攻击，现在，这以柔术取人的张群走了，可能下一场就要叫他那凶神恶煞的胡、王二将出台了。我感到这个虎穴再不可以久留，好在我人民解放军已向川西平原进军了。

十二月七日我们从成都出走了。本来打算尽可能在这里同蒋介石反动集团周旋下去，以争取时间，等我人民解放军接近成都时再行动。但是事情已经逼到了尽头，不容许我们再耽下去了。这几天来的成都，好象辛亥革命前夕保路同志会进城时的情景，满街是人，纷纷扰扰，昼夜不宁。加之特务到处逞凶，迫害革命人士，劫掠居民财物，简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关心我们的朋友都催着赶快走，郭勋祺在六日一连给了我三次紧急警报，说得自可靠方面消息，敌人已经作好布置，马上就要开始行动。特别是胡宗南部盛文已被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据王陵基部担

任北门城防的一个连长(原为我二十四军军士,早有联系)六日深夜匆忙赶来报告我,说盛文部队定七日晚上六时来接替城防,届时他们就要移交。这就是意味着过此以后,我们就出不了城了。警报一个接着一个传来,邓锡侯这天一大早就到了我家里来商讨应付办法,不久王缙绪、邓汉祥也来了。约莫是上午九时左右,蒋介石的侍从室打电话来,说蒋午后四时约我到北较场去谈话。邓锡侯立即打电话回家去问,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我再叫王缙绪打电话去问他家里,他却没有接到。我结合几天来一系列的情况判断,肯定蒋介石要来最后一手,我们一去北较场,就“请君入瓮”,要么就屈服于其淫威之下,下令所部参加反共战争,永远作人民的罪人,要么就作阶下囚,长期丧失自由,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既然走人民的道路,断不能自投罗网,于是我和邓锡侯共同决定立即出走,并商定:下午一时各人在家里动身,从北门出城,在城皇庙会齐,再到梁家巷乘车去崇义桥,然后继续向彭县前进。其所以要朝这条路线走,由于东面和北面都有胡宗南大军把守;要西走雅安,王陵基部队又早已在邛崃、大邑一带布防,正和我二十四军对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要想安全地越过敌人警戒线是很困难的;只有西北角敌人尚无战备,出城不远即为邓锡侯所属黄隐部所控制,可以自由进出;同时这里离成都都不远,既便于掌握已经联系好了的川西地方武力,又便于向蒋军进行策反工作。因此,我们就选定彭县作为起义的地点。

主意定了,分头行动。我考虑到,要过两关:一要避开住宅周围宪兵的监视,二要瞒过敌人守城部队的盘查,才跑得脱。因此,决定让工作人员个别携着电台和重要文卷先行(秘密文卷焚毁),到城外指定地点集中,我自己不带任何行李,只有二人随

从,乘汽车从大门泰然而去,举止一如平日。这样,第一关就安全度过了。我犹恐出门之后,特务马上发觉再出乱子,还在我所经过的路线和会齐的地方布置了便衣警卫,以防万一。这时来到了北门城门洞附近,将要过第二关了。本来我同王陵基派在这里的守城部队早已联系好了,他们是不会留难的。但是检查站有蒋的宪兵、特务在,还有可能出岔子。所以到了隔城门洞尚有相当距离的转角处即下车,让空车由城门洞开出去,到城外梁家巷过去一处树阴隐蔽的公路旁等候。如果哨兵盘问,说是我派到凤凰山飞机场去接客的。我自己则从左侧城墙的一个缺口翻过去。时我正在病中,气喘如织,汗流浹背,由两个随从扶掖而行,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终于度过了第二关。到了城皇庙,邓锡侯已先我而至,危难中逢老友,感到分外亲切。二人徒步而行,从田野小径直插停车处,跟即登车向崇义桥疾驶。这时我感到自己好象是脱笼之鸟,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真有说不出的轻松愉快。

当日午后四时到了崇义桥,邓锡侯部有步兵一营驻此。我因连日劳病交加,身体感到极度疲乏,在这里住了一晚。卸下行装,即急电我西康省军政负责干部告知我的行动,叫他们按照既定计划步骤准备行动。同时指示我驻在成都武侯祠和成雅道上的部队严加戒备,准备战斗。时民盟和民革的一些同志亦因成都风声很紧来到这里,我曾和他们进行了联系。夜间邓部将领黄隐、谢无圻也赶来了,会商了初步的军事部署,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次日清晨移驻龙桥,分别通知我在川西各县所掌握的地方武力立即动员起来,相机配合我军的行动。午后一时许,王缙绪从成都来了。我知道夜猫子进宅是决不会有

好事的，早就有了戒心。果然，王一进门就说：“我是奉老头子（蒋介石）之命而来的。他告诉我，他同你们过去的一切都是出于误会，无论如何要请你和晋康回成都去，一切都好商量，如不见信，他可以叫蒋经国来作质。”王谈到这里，从身上掏出了顾祝同寄给我和邓锡侯的一封信，信中大意说，蒋已决定撤王陵基的职，派我和邓主持川省军政大计，谈了许多好听的话，结论同王所说的一样，叫我们回成都去。我觉得他们玩这一套，简直是儿戏，当然不值一顾，但亦不妨就中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同时对王缙绪这个不成器的货色也需得摆布一番。于是我佯对王说：“我们所以要离开成都，为的是反对蒋在成都平原作战，以免地方糜烂，只要蒋答应这一点，旁的一切都好说。但是不能说空话，要过硬，办法是立即免盛文的职，我和晋康保举你继任成都卫戍总司令来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王乍听此说，觉得有点局促，沉吟了一下答复：“这重的担子，我咋个挑得起，但是桑梓关系，又有你们撑腰，只好勉为其难。”我就同邓锡侯联名给顾祝同写了一封回信。首先提出三点：反对蒋在成都平原作战；立即免盛文成都卫戍总司令职，胡宗南部在两天内撤出城；以王缙绪继任卫总，以四川保安部队来维持地方秩序。接着就给他们以威吓：如果蒋一定要在这里作孤注一掷，使地方受到糜烂，那么，我们就决率所部与之周旋到底。我们来这一下，本来是表示同蒋最后摊牌，可是王却视为珍宝，兴高采烈地带着这封信回城交差去了。尽管如此，我们对王之为人实在领教够了，惟恐其此行还兼负有特务使命——侦察地形，让蒋介石空军按图索骥，来一个大轰炸。故王走后，我们就连夜向彭县进发。后来，王缙绪还派了一个代表，张群和胡宗南也派有人先后到彭县，向邓锡侯进行挑拨

分化,劝邓单独回成都,但是邓未为所动,敌人的这一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九日我和邓锡侯、潘文华联名从彭县向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主要内容是:声讨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郑重声明,我们自即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并令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和公共财产,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残余。我二十四军将领刘元璋、伍培英、刘元琮同邓潘两部将领黄隐、潘清洲等,亦于同日发出拥护起义通电。

我们起义通电的发表,事前也是经过一番周折的。到彭县后,立即成立了一个有中共同志和民革、民盟同志参加的政治小组,我派李铁夫、李静轩二人代表参加。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商讨关于起义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费了商量,(一)是发表通电的时间。有的认为,人民解放军距成都尚远,敌人的军事压力很大,主张从缓。我和一些同志则认为,我们从成都出走,就是表示我们同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决裂,势不两立,敌人决不至因我们尚未发表通电这一形式而放过,同时我内心还顾虑蒋帮接二连三地派人来挑拨分化,可能引起内部猜疑发生事变,故力主立即行动。经过反复商量,大都同意后一种主张,其特别持重暂不愿意在电文上署名公开表示者则听之。于是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二)是电文措词。我恐怕临时来不及写文章,故先在成都拟好文稿带来。当提交小组讨论时,因文内称蒋为贼,有的同志就觉得“昨天还称蒋委员长,今天就叫蒋贼”,在思想上感情上通不过。经过一番周折,最后也还是归于一致了。这时,“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我们在彭县的电台,不明中央呼号,不能

直发北京，乃电雅安电台转发。党于八年前在那里设置的秘密电台，在人民革命事业将要在全国胜利的时刻，用它来把我们起义的信息传送给伟大的人民领袖，这使我感到万分的兴奋。

我们的起义通电发表后不久，就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的复电。他对我们慰勉有加，并恳切指示，叫我们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喜讯传来，我三部官兵莫不欢欣鼓舞。时我二十四军官兵正在前线与王陵基和胡宗南部对峙，准备战斗，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感奋，都怀着最大的光荣感来接受党所交给的任务，坚决表示要积极贯彻朱总司令的指示，在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的基础上，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蒋军残余，首先要打好西康的阻击战。我西康省的行政领导干部也及时把党的有关方针政策，人民解放军的有关指示和我的起义电文，分别在康、雅、宁三属向各族首领进行了传达；全省人民莫不热烈拥护，从而西康省就光荣地获得了和平解放。

我在彭县起义前后，还向部分蒋军进行了一些“策反”工作。其中联系时间较久并起了一点作用的有两部分：一是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部，这个部队原为孙震所率领。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我在重庆曾向孙本人作了一次试探。我向他说：“蒋的败局已定，我们今后向何处去，须早作打算。”孙只答复了一句话：“共产党还惹得吗。”我认为此人陷溺已深，不可救药，乃转而向其副手董宋珩进行工作。董和我是保定同学，平日关系较好，经过几度商谈，他表示愿意和我一道走人民的道路，因而对其所属将领也加强了联系，还对其亲信将领作了思想准备工作；我与

之常取联系,并在经济上给以支持,故工作做得比较切实。原来约定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川东时就行动的,后因孙元良到了这个部队,不免受到一些牵制,加之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准备不及,故未能实现,同其他蒋军一起败退川西。这时董亲自下去掌握了部队,我们到彭县后,董即赶来和我们面商,我促其立即行动。他回去后,发动所属将领逼走了孙元良(时孙震已飞台湾),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率所部三万余人在金堂、广汉地区宣布起义。另一部分是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部。一九四九年春间,该部移驻重庆,我即派西康省政府前秘书长杨某利用亲戚关系与罗进行联系,策动其弃暗投明。罗本为蒋的嫡系,但见大势已去,不愿为蒋殉葬,故亦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致行动。七月间,我曾派杨某策动他以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官兵生活不能维持为理由,发表文电,对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进行了一次公开谴责,并准备发动所属士兵向重庆进行武装访问,当时全市为之震动。但是他同蒋介石的关系终究不易割断,当蒋卷土重来,他又犹移起来了。这次罗部败退川西,我又派杨某动员罗的父亲,函召罗到灌县,以骨肉之情劝其起义,罗志遂决。后来我还派人到郫县两路口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商,他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也从彭县发出了起义通电。此外,如陈克非、喻孟群、刘兆黎等部,我和邓锡侯在彭县时亦向他们进行了一些联系和说服的工作,后来这几部分也走了起义的道路。我完全明白,以上这些部队的所以起义,都是由于共产党和毛主席德威感召的结果,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无敌形势所迫的结果。我们的“策反”工作,充其量不过是起了一点穿针引线的作用。假使没有上述两个根本性的条件,我们终究是无能为力的。

七、西康的阻击战

西康阻击战的准备工作，我们在宣布起义前四个月就开始进行了。当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和平解放时，王少春向我说：“军事形势的发展很快，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个月后即可能向西南进军，军事斗争已经提到了我们首要的议程。”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并和他进一步作了研究，认为总的要求应当是，把我们在军事上的有限力量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有效的配合；而在进行作战准备时，既要与将来战争的发展相适应，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军目前的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决不能在青黄不接之际，先为优势的敌人所吃掉。原则决定以后，我就派我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桢到成都，征询四川地下党的意见。当和熊扬、张桢祥商定了如下的方案：

（一）如胡宗南部在陕西地区被解放军击溃向川康方面逃窜时，二十四军应截断其去路，配合解放军彻底消灭之。

（二）如胡宗南部未被解放军击破即向川康方面撤退，解放军在后面尾追时，二十四军应阻止其向西康方面退却，配合解放军夹击消灭之。

（三）如胡宗南部未经解放军压迫自动向川康方面撤退时，二十四军应独立行动，以牵制扰乱的办法，阻止胡军占领和巩固西康，以待解放军的到来。

（四）二十四军在现阶段，应利用封建的外衣充实民主的内容，从物质上精神上为将来配合解放军作战预作准备。

九月间，四川地下党复派张桢祥到雅安，就上述方案的具体

实施同我们作了进一步的协商。后来，川东党特委会也派刘连波到成都，同我们进行了联系。

我们在军事上的准备，就是按照同四川地下党所商定的方案的精神去进行的。头一阶段，即九、十月间，我们是着重抓部队本身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主要的作了下面两件事：（一）在我军内部正式提出了“人民为第一，一切为人民”的口号，并有选择地向中上级军官传达了党的工商、土改和统一战线政策；（二）储备了一批粮秣和硬银。正是因为有了这点准备，所以后来宣布起义后，接着就同蒋军展开战斗，而我官兵在思想上并不感到突然，同时在后勤供应上，也大体上保证了作战的需要。

十一月初，我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两将军率领的华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一部，分东北两路，浩浩荡荡向四川长驱直入，同时蒋介石自诩为最后的一张“王牌”——胡宗南部亦从陕、甘南部经川北向川西撤退。敌我动态都表明，革命与反革命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场大决战将要在川西平原展开。依据同四川地下党商定的方案，我们的任务应当是，阻止蒋军窜入西康，配合人民解放军将敌人全部歼灭于川西平原。因此，我们决定了如下的决心：我军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行动，迅速解放川康，决以主力封锁成雅公路，一部封锁乐西公路，并在成雅公路沿线配置机动部队和民众武装展开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坚决阻止蒋介石军窜入西康境内，以促使其全部就歼于川西平原。

我们军事上的准备情况，由王少春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得到了指示，他告诉我：“中央重视西康目前的战略地位，希望我们打好这一场阻击战，为人民立功；如遇优势敌人压迫情况危急时，

可以向东转移。”由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有人民解放军作依靠，同时在整个作战期间又通过王少春与中央军委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就使得我们明确了方向，坚定了战志，在优势敌人面前敢于战斗，并坚持到胜利。

我们在彭县通电起义之后，西康阻击战的序幕随着就揭开了。战斗经过大要如下：

成都之战与西昌突围

胡宗南部于十二月十三日，向我成都武侯祠驻军发动了进攻。我们部署西康阻击战时，原来给这个部队规定的任务是：掩护地下工作人员和与中共通讯的无线电台；保护华西坝的广播电台和四川、华西两大学；可能时抢救被蒋帮特务拘禁的革命同志；根据情况发展配合友军作战。十二月初，我人民解放军展开了川西大围歼战，蒋军盘踞下的成都变为恐怖世界，有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我们在城内的工作人员先后转移到武侯祠及其附近，在城外继续进行活动。这里就成为我们对敌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据点。当我们在彭县起义的第二天，蒋介石即以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命令，限这支部队在十二日以前撤退到新津河西岸。我认为这个钉在敌人身上的一棵钉子，我们能多守一天，对敌人的行动就多牵制一天，而人民解放军就多接近一天，故指示他们坚守。到第三天晚上，胡部第三军竟以数倍于我的兵力，附以大炮坦克，向我们这支部队发动了疯狂的攻击。该部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奋起应战，激战至翌晨8时，终以众寡悬殊，阵地为敌突破，我大部分官兵牺牲，一部分被冲散，一部分被俘虏。所幸在这里的中共同志和民主人士都已安全转移，得免于难。

胡宗南部向我成都守军攻击的前一天，已在西昌向我当地守军发动了进攻。我们原来对伪西昌警备部，因其孤悬彝区，兵力有限，决定先从政治上孤立它，然后策动其起义。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看来已有这种可能。到了十一月下旬，胡宗南部旅长朱光祖率领的一个加强团空运到西昌以后，伪西昌警备部以为有恃无恐，又改变了主意。当我们的起义通电发表后，宁属各族代表人物纷纷表示拥护，伪警备部则使用反革命的两手，一面对西康的和平解放表示同情，一面纠集其全部兵力对我军形成包围态势。我伍培英副军长鉴于争取敌军起义已不可能，同时敌我又优劣异势，乃决定主动撤退。先调刘文虎营在锣锅梁子掩护，自己率领主力于十二日晚上，以最迅速的行动冲击敌人的包围圈。在突围中，曾在安宁河西岸展开激烈战斗，予敌人以重创，使之不敢追击。在这一战役中，我军死伤官兵三百余人，高级参谋薛奉元、营长刘文虎阵亡，刘石泉失踪。我们以固守西昌的敌人已成瓮中之鳖，对西康整个战局影响不大，就依照预定计划将这部分兵力转移至富林，加强乐西公路的阻击战。其留在会理未撤出的一个营，受中共滇西游击队司令员朱光璧指挥，在康滇边区打游击战，解放后才归还建制。历来汉族军队从宁属地区败退，无一不为彝人所消灭。这次我军由于是起义，跟着共产党走人民的道路，所以得到彝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能够例外地安全撤出。

成雅道上的阻击战

成雅公路是敌人窜入西康的主要路线，故我军主力也配置在这条线上。从成都南郊武侯祠起一直到雅安止，沿线都有一

定的部署。我们同时也考虑到，敌人窜入西康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川西大会战前，调大兵团侵占西康，保持退路；一是在川西大会战失败之后，一群群的漏网之鱼涌入西康逃命。但是无论出现何种情况，都不是我们这点兵力所能抵挡得了的。因此，我们采取的作战方针是：正规军与地方武力配合，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节节破坏，段段抵抗，以此来迟滞敌人的行动，争取时间，让我人民解放军赶到聚而歼之。我们在成雅线上的阻击战就是按照这个方针来进行的。

阻击战的前奏曲：十一月下旬，胡宗南以护送该部家属为名，派遣一个独立旅沿成雅公路向西推进，企图进驻雅安，以控制整个西康局势。与此同时，驻在西康的蒋帮特务指使地方土匪陈志武等在芦山、名山一带进行骚乱，以与胡军的行动相配合，借以牵制我军。我们对敌人的这一阴谋，立即采取了坚决的行动，当胡军到达邛崃地区时，我驻在该地区的守军即坚决予以阻止，不使其侵入康境。其在芦、名地区制造的骚乱，亦为我当地守军及时击溃，乱子没有闹得起来。这就打破了敌人西窜的尝试，也为尔后我成雅道上的阻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习打游击：我们本来不懂游击战，在中共同志的帮助下，这次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从成都南郊起经双流、新津至邛崃长达二百多里的公路上，配置了五支大小不同的部队，以整化零，联系地方武力，向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我原驻双流的一个团，当我们宣布起义后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立即化整为零，转移到马家寺一带，向成都至双流以东展开活动；新津河下游至双流以西，我从西康保安团队中抽调了五个连，派一个区保安副司令率领，化装为当地自卫队，于十二月六日起开始在这一段进行活

动；新津以西，配置了一个营，附以轻炮，一部驻新津飞机场附近，一部驻宝子山，十二月十四日同敌人一度激战后，也随即分散转入游击战；邛崃地区是我军阻止敌人窜入西康的第一道防线，四川地下党早就在这里建立了游击根据地，由我供给枪枝子弹，并派我一三六师副师长萧绍成负责军事，四川地下党派李维嘉、马识途等负责政治领导。他们除了联系邛崃、大邑、崇庆、蒲江等县地方武力外，还广泛地动员了群众，建立了人民武装，声势颇为浩大，在十二月初即积极展开战斗。这些游击部队的任务是：相机破坏沿途公路、桥梁和飞机场，截击敌人辎重，袭击敌人驻地，扰乱敌人行军，以迟滞敌人的行动；当人民解放军到达时，即参加后勤支援和充当向导。后来他们都是这样执行了，曾给成雅道上运动的敌人以一定的牵制。但因我们对游击战毕竟没有经验，最根本的还是没有群众基础，所以发展极不平衡。一般说来，任务是执行了，但是本身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以致不能坚持下去。只有邛崃地区的游击队，由于有中共的政治领导，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表现得特别好，在胡、王部队西窜期间，不断地英勇作战，歼灭敌人，缴获敌人的枪枝达二、三千支，为我们成雅线上的阻击战作了有力的支援。

洪雅丹棱之战：胡宗南眼见前面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节节进逼，后面的退路又为我军截断，感到非常恐慌，乃决定由王陵基作开路先锋，率领九个团，分由洪雅、丹棱、蒲江、邛崃各地进犯雅安，妄图以此来击破我军主力，打开一条逃窜之路。十一月底，王陵基乘我驻洪雅部队向雅安集结的时机，即驱使其盘踞眉山、丹棱一带的部队占领洪雅县城，后续部队源源而至，准备向我雅安大举进犯。我们为了排除侧翼威胁，以便集中力

量阻击从成雅公路正面西窜的大股敌军，乃决定以一三七师全部向洪雅发动攻击，首先解决这部分敌人，然后移至丹棱、蒲江，配合我正面部队作战。为了适应旧社会的特点，我还抄袭了一次蒋介石的老文章：“悬赏一万元，生擒王陵基”，以灭敌人的威风。我一三七师于十二月十日开始行动，十二日即攻入洪雅县城，敌人向丹棱狼狈逃窜，并赶调两团援军，在丹棱以南的狮子坡组织防御，以阻止我军的进攻。我军规复洪雅后，依照原定计划继续向丹棱前进，于十七日拂晓向敌人发动攻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击破了敌人的防御阵地，逼近丹棱县城。敌人匆忙调集援军，继续向我反扑，敌我战斗正酣，我人民解放军三十六师已渡过岷江进抵丹棱，十七日下午五时与我军会师，协同作战，敌人即纷纷向东逃窜，洪雅、丹棱之战遂告胜利结束。我一三七师随即回师雅安，迎接新的战斗。

邛崃名山之战：我人民解放军在川西平原布下的天罗地网越收越紧，蒋军被迫纷纷向川康边境逃窜，从而我们在成雅道上的阻击战亦随之而进入紧张阶段。十二月九、十两日，胡宗南部警卫师七个营和王陵基部五个团已窜至邛崃地区，同时胡部的六十五军亦由崇庆向邛崃前进。我邛崃守军以众寡悬殊，乃依照原定计划主动撤至邛崃县境的太平场、夹关一带布防。十五日王陵基亲率七个团，由邛崃、蒲江出发向我雅安进犯，我军亦分两路迎击，十六、十七两日与敌人激战于太平场和名山的百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十七日夜间，我军发现沿邛雅路两侧前进的敌人，对我太平场和百丈的部队形成了包围态势，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状况，故又于十八日撤至太和场和新店子，利用有利地形和预筑工事，继续阻击敌人。敌人在太平场和百丈遭受我军

打击后,行动已较缓慢,至十九日才接近我军新阵地。我军在这里又进行了一天的战斗,予敌人以重大打击,然后才撤至名山。此时我们正增调我一三七师部队驰援前线,准备向敌人发动攻击,我人民解放军已在邛雅路两侧纵横扫荡,敌人呈现一片慌乱现象,旋于二十一日纷纷向邛崃县境的夹关、平落坝、高兴场一带溃退,王陵基本人亦于此时化装老百姓,戴着黑眼镜,溜之大吉了。二十二日我军与人民解放军在百丈第二次会师。逃窜中的胡、王部队,经我人民解放军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连续三天的扫荡,全部被歼灭于邛、蒲、大邑地区。至此我军在成雅道上的阻击战乃告胜利结束。

乐西道上的阻击战

乐西公路是川康交通的两大动脉之一,亦为蒋军由川西南窜入西康的孔道。我一三六师部队早在富林以东的天然险隘黄木厂构筑防御工事,十二月初又配合地方团队对富林至峨眉这一段公路择要加以破坏,以阻止敌人西窜。十七、十八两日,岷江以西各县相继解放,困处川西南的蒋军已全部陷入我人民解放军的大包围中,一群群的漏网之鱼,冒死沿乐西路向西逃命。二十日,胡宗南的二十七军、宋希濂的顾军和王陵基的易团等残部,共约七、八千人窜至黄木厂附近,二十一日开始进攻我前沿阵地,二十二日以大部队进攻我主阵地,时我从西昌撤出的部队已经到达富林,集中力量坚决予以阻击,激战两日,卒以众寡不敌,于二十三日撤至富林以西,固守小关子、金鸡岩之线。敌人因受到我军的阻击,于二十四日进占富林后即不敢贸然前进,在此滞留了三天。我军于二十七日发动反攻,敌人乃偷渡大渡

河向西昌逃窜。我军规复富林后，重整防御阵地，继续阻击西窜之敌。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胡宗南部师长王伯华率众四、五千人又窜到了富林附近。此时成都已经解放，川西平原的蒋军全军覆没，我解放大军正乘胜向西挺进，我们以为这股流窜之敌到了穷途末路，可以不战而屈。乃发动当地开明士绅向王伯华晓以利害，叫他放下武器投降人民。谁知这群亡命之徒执迷不悟，硬要作困兽之斗，我军与之在富林、清溪地区进行多次战斗，后来转移到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大相岭对峙，前后纠缠了一个半月。就这样，使我们争取了时间，我人民解放军于二月十八日达到荣经后，这股敌人终被歼灭，我们在乐西道上的阻击战也就胜利结束了。

丹康线上的阻击战

西康丹巴与川边懋功接壤，有邛崃山脉横亘其中，地广人稀，交通异常困难。我们原来估计盘踞川西平原的敌人决不可能朝这条路走，所以在这方面没有配置较多的兵力。谁知事出意外，蒋军田中田和杨森等残部共约二千人竟于一九五〇年二月间从这条路窜到了丹巴。时我在康属地区的部队大都调往泸定，以策应成雅、乐西两路的阻击战，并镇压天全、芦山一带的股匪，一时抽调不及。当警报传来后，我们立即动员群众，在丹康路沿线实行坚壁清野，断绝敌人粮秣，同时在乾宁、大炮山、中古等地组织防御，逐次抵抗，以阻止敌人前进。终因敌众我寡，康定一度陷于敌手，我西康省府乃转移康定县境的营官寨继续抵抗。此时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大肆造谣惑众，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派在康区的爪牙亦到处煽动反共，情况非常混乱，连我们自己队

伍中的少数不稳分子如唐英、傅德铨等亦发生动摇，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在此紧急关头，我西康省府一面动员地方民团武装，坚决抗击敌人，一面分区召集土司头人和寺庙喇嘛开会，说明党的政策和川康解放的胜利形势。这样，就稳定了局势，遏制了叛乱，到三月二十四日我人民解放军进军康定，田、杨残部即四散逃命，我西康省政府也由营官寨回到了康定，我们的西康阻击战也就最后结束了。

蒋军对我个人的报复

我在彭县起义后，蒋介石反动集团除了在军事上向我军进行疯狂的攻击以外，同时还抄了我的家。胡宗南部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把我成都玉沙街的家抄了；王陵基部于十二月上旬把我大邑的老家抄了；田中田部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上旬把我康定的家抄了。他们犹以为未足，还想进一步谋害我全家。胡宗南部抄了我成都的家以后，竟在我的住宅内秘密埋下大量黄色炸药（后来人民解放军工兵在这里取出未爆炸的一部分，重一百多公斤），装置雷管，企图等我们胜利归去，一触即发，全家不留。后因胡军撤走，一些坏分子侵入盗窃残存财物，误触雷管，发生爆炸，三幢房屋被炸毁了两幢，还死伤了一些人，我才未搬回去，全家大小才得以保全。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这种野蛮的暴行，我深刻的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意义。我们过去在四川进行军阀混战时，彼此为了争权夺利，尽管在战场上拚命搏斗，寸土不让，但是双方的家庭都住在成都，还是和平相处，互不侵犯；而今天蒋介石反动集团则必欲置我全家大死于死地而后甘心，前后完全是两种情况。其所以如此，因为军阀间的混战是反

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最后服从于阶级利益,所以大家都不为已甚。今天我与蒋介石反动集团之间的矛盾,由于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所以他们对我怀着刻骨的仇恨,不共戴天。这种严酷的教训,更坚定了我的政治立场,自从宣布起义以后,我就抱定决心,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一刀斩断,毕生跟着共产党走人民的道路。

我们西康的阻击战,前后经历了三、四个月,有不少官兵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由于我二十四军还是一支未经改造的旧部队,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总的说来,这个仗还是打得不够好的,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所接触的敌人大多是一些残破之师或漏网之鱼,在效果上也不过是给敌人的行动略为增加一点困难,迟滞一点短暂的时间,最后还是等上我人民解放军到了才把敌人歼灭。就是在起这点微不足道的作用的过程中,我军本身的安全也曾遭遇过多次威胁,而在每一个危险关头,都是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及时赶到然后才转危为安。因此西康的和平解放,应当归功于共产党,归功于人民解放军,而我们自己的努力实在是说不上。

我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开始反蒋起,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彭县起义止,经历了整整二十年。这漫长的岁月,是在反蒋和亲共的道路上度过的。我的反蒋本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却因失败而倾向于亲共。我的亲共也是违反阶级利益,亦因时势推移由假变真而导致了起义。其所以能如此,党的领导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党热情地争取我,团结我,教育我,支持我,使我逐步认识了真理,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取得了前进的力

量,然后才有可能背叛反动阶级,参加人民阵营,踏上新的光明的政治前途。从我过去长期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深切地体验到党的伟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

彭县起义,是我个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自从西康和平解放后,我即把作为反动统治者所拥有的军队、政权、经济一起交给了人民。这是旧历史的终结。与此同时,我又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之一参加了新的政治生活,从地方到中央都有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是新历史的开始。但是新旧历史的转变,同时也给我带来了旧思想与新事物的矛盾,与新的政治生活不相适应。因此,我一入新社会就订定了三条自我改造的原则:否定过去,肯定现在,相信未来。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把自己过去为反动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思想意识和态度作风,都肯定是错误的,积极进行改造,一点也不可惜;对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新社会的各种新事物,无条件地拥护;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个现代化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一定要到来。十二年来,我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就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当然,这是属于世界观的根本改造问题,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今后决定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通过学习和实践,去加速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成为永远忠于党的好干部。

发扬民主 畅所欲言*

我这次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这次大会在高度团结的气氛中，一共开了半个月，从上月十五日开幕，三十日闭幕。我现在将会议情况结合个人体会，不用说是很肤浅的体会，提出来向诸位谈一谈，可能是会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还要请诸位指正。

首先，我谈会议总的精神。全国人大已经开了三次会议，我每次都是出席的，特别这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我们在会议以前，都曾经到一定的地方，包括城市、农村，作了视察，与地方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有一定的接触和联系，但是我感到还远不够广泛，更不够深入，不过就这样，也就使我们能够有根据地把一些地方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向会议反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供大会研究、采择，这是一方面。同时，另一方面，就我个人来说，每次出席会议，都等于上了一次大课，特别这次会议，是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涌现后举行的，因而对我更具有深刻教育的意义。

这次会议，我认为从始至终，贯穿了一个精神，什么精神呢？

* 一九五六年七月在四川省政协传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三次会议精神的报告。题目是后加的。

就是进一步发扬民主的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进一步的民主精神，形成了整个会场无比团结的气氛。因为人民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自己选出来的代表，会场上的团结，正体现了中国六亿人民的大团结。中国六亿人民在三大改造高潮中，充分以事实表现了他们要奔向社会主义的坚决决心，热烈意愿，因此，反映在这次会场上，任何角落也都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气氛。这种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形成的团结，使出席的每一个代表都沉浸在一片和悦兴奋之中，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描述的。

我曾经同一位政府负责同志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那时会议还没有结束，我问他这次会议开得怎样？他说开得很好，我又问他怎样好？他简单答复我一句，大家做到了“畅所欲言”。真是一句非常扼要的话，说明了我们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我想，“畅所欲言”，可以分作两方面来看。从人民代表说，表现了进一步当家作主的精神。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天起，人民已经作了国家的主人翁。开始由全国人民政协执行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这种权力便移转到人大。人大到现在已经开了三次会议，前年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作为我们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去年第二次会议又在三年经济恢复基础上通过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最近第三次会议的召开刚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踏步前进的时间。前两次会议中，不少代表都针对着会议的主要问题，踊跃地发表了意见，并向大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提案，总的看来，一般是对政府工作偏重在肯定成绩方面，也在大会发言中，小组讨论中指出了某些缺点和问题。不过是否作到“畅所欲言”？凡是耳目所及，见到的，听到的，是否已经毫无

保留地尽量谈了出来，可能还有问题。这说明当家作主的精神尚嫌不够，特别大会发言，仿佛还具有一定规格形式，可以看出，这是旧社会留下的影响，在我们心灵深处，没有全部扫清，主人翁的实感，不够深刻。解放的时期只有这样长，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次会议却大大不同了。代表们对于政府任何部门的工作，结合视察的情况，成绩了成绩，缺点了缺点，成绩就肯定下来，缺点更明白指出，没有丝毫顾虑，真正是“畅所欲言”，见到那里，说到那里，热情满腔，真诚坦率，总的目的是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所以，这次会议，一般说来，也是会议的特点，是偏重在指出缺点，提出问题，作为今后政府工作改进的依据，自然，政府工作的成绩，也是同时予以肯定了的。诸位首先从报纸上所载代表们的大会发言中，可以清楚看出这点，这就进一步发挥了代表们当家作主的精神。周总理在会议闭幕时说，这次会议开得好，除了在大会上发言的二十八位政府工作人员外，所有其他在大会发言的代表，都提出了好意见，提出批评，小组上也是一样，这是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最高权力的表现。我觉得周总理这几句话是完全符合这次会议的实际情况的。

这次代表们在会议中作到“畅所欲言”，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即从政府方面说，党和政府几年来领导全国人民循着国家总路线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显著成就，但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正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过程中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中各方面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促进国家建设的顺利发展，党和政府要求大家对于政府工作多多指出缺点和错误，便于前进中不断改善，提高工作效率，

使各部门的工作,真正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是敢于正视自己工作中的任何错误和缺点的,尤其是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不久前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紧接着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三个五年计划内便要把它建设成功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艰巨工作中,要想不犯一点错误,没有一点缺点,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问题在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及时揭露缺点,改正缺点,这就会使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不断前进。政府这种对于工作缺点期待揭露批评的殷切心理,正鲜明地表现出党和政府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大公无私的态度,体国公忠的精神。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说,工作成绩是应该的,要多多指出缺点错误。而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确这样作了,真正无拘无束,做到了“畅所欲言”。这说明政府和人民利益的一致,要求的一致,归根到底,就是大家一致要求加速建设社会主义。以上是我对于这次会议的一个总的体会。

其次,我再来谈谈有关国家的预决算问题,因为批准一九五五年的国家决算和通过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对于预决算内容,我准备结合各方面讨论的意见,扼要加以说明。

我们的国家预算是与我国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密切联系着的,它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极其巨大的保证作用。它根据国民经济计划,动员和积累必需的资金来扩大再生产,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福利,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加强国防力量;反过来,由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再生产的不断扩大,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逐步提高,也就保证我们能够顺利地完
成国家预算,两者间具有相互推进的密切作用。因此,我们国家经济的计划性质,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国家预算的计划性,也决定了它的稳固性。我们国家一九五五年的决算,收支相抵,还结余一十亿零一千一百零三万八千元;这不是说明了它的充分计划性、稳固性吗?同时也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五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中以具体数字体现出来。诸位把国家统计局的公报看一遍,就很清楚了。

单就去年国家预算执行的情况来看,基本上良好的。但是,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呢?这在会议小组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从各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例如有的提,去年基本建设节约了十亿余元,是否都是属于应该节约的范围内,值得怀疑,北京清河制呢厂新建厂房屋顶太薄,不能御寒冬,屋顶漏水,机器被淋的生锈,去年新建工人宿舍,由于造价降低,已裂了许多缝,有些已漏雨,今年又返工。某单位在良乡盖的十幢土坯房子,已倒了两幢,电力工业厂新盖的房子也下沉了,这是节约还是浪费!在质量上节约是自己骗自己。质量坏,施工虽然也有问题,但主要是过分强调节约造成的。所提十亿节约中是否包括这类节约?过去有许多浪费是由于不适当的节约造成的,应该对节约的标准加以科学鉴别。

有的认为,一九五五年商业收入计划未完成,没有批评商业工作中的缺点,而把原因推到工业上去,这样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公道,根据这次视察所见,商业利润很高,应该完成收入计划。如葡萄糖每磅工厂成本五角九,工业利润每磅三分,而商业利润达九角八,为工业利润的三十多倍。商业工作本身是存在不少

缺点的，如商业一方面有积压，一方面有脱销，供应不及时，夏天卖绒布，验货没有标准，旺季宽，淡季严。财政部门有责任去监督检查这种不合理现象。商业收入未完成，应从主观上多作检查。

有的认为，一九五五年国家用于社会文教事业的结余费用很多，实际支出占预算数百分之八十二点八二，事情没有办好，地方要钱不给，街道民办托儿所经费困难，要求财政上给予补助，提出来没人理。

有的认为，卫生支出，财务部门扣得紧，结余不少，但是病人无钱，进不了医院，而医院有不少病床闲着。

有的认为，由于各部“条条”限制太死，专款专用，以及中央对地方管得过多过细，造成一方面钱多用不完，另一方面应办的事业不够用，影响建设速度。财政部不相信别人，也不放心地方，对下面抓得过紧，影响下面积极性的发挥。所谓收入打足，实际上是打的太高，努力也完不成；支出打紧，实际上是打的太低。

有的认为，地方预算草案，如能采取自下而上的编审办法，先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后再报中央，会更切合实际，可否考虑改变现行的预算编审程序。

其它意见尚多，我就不再详举了。

我现在再谈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是和平时期的预算，是反映社会主义高潮，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算。今年收入共为二百九十七亿三千一百七十三万二千元，上年结转收入十亿零一千一百零三万八千元，收入总数共为三百零七亿四千二百七十七万元，支出总数同

上,收支平衡。与去年国家决算比较,本年收入增长百分之十五点八三,支出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七。说明今年国家预算收支增长很大,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再说预算收入的来源和它的支出用途。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积累,它几乎占到预算收入的半数,其中国营工业增长最快,比去年增百分之三十一.二七。预算支出的主要用途,是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这是表现了社会主义类型国家自己的基本职能,即经济组织者和文化教育者的职能。本年预算规定经济建设的支出占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二.二二,比去年经济建设支出实际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四五,其中工业支出占百分之五十三.二二,而重工业又占工业支出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八.五九,都比去年有很大增长,同时也注意积极发展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以保持应有的合理的比例,这是完全符合我们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需要的。今年国民经济计划实现后,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九,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将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六.五,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社会主义成分将取得绝对优势的地位。这意味着我国正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意味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

我还须说到,今年预算轻工业和农业的支出均增加了很多。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增加国家建设积累两个方面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注意,这并不是取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即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原则所确

定的，同时也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为出发点的。预算增加对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是为了更适合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在比例上加以适当调整，使其更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由于资金积累的加速，还将更有利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此，我们要认清这是比例的调整，而不是方针的改变。

我还想谈到，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本年预算共支出七亿九千一百四十五万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六。这是有利于兄弟民族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发展的，因而也是对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有利的。这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伟大的民族政策的体现。周总理在谈及中国民族关系时指出，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口多，地大物博，汉族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仅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占百分之六。但是汉族地区只占全国面积百分之四十，少数民族地区占百分之六十，地下蕴藏也极其丰富，“三分天下有其二”（指地大和物博而言）。因此，从人力上、物力上、财力上帮助兄弟民族加速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还有，今年国家预算支出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人民福利的关怀，今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将提高百分之十四点五；广大农民的生活，将由国家从财政上支持农业的发展以及采取合理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等措施，而得到显著的提高；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的生活，也将由于厂店改善经营管理、调整工资、解决医疗福利问题等而随着改善和提高。从预算支出中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

最后我要指出，今年预算规定国防费的支出比去年国防费

决算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二五，在预算中占百分之十九点九八，也说明我们的预算是和平建设的预算，反映了我们一贯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反映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精神。在当前国际形势走向和缓的同时，要看到美帝国主义的好战分子，仍未放弃它的“冷战”政策，“实力”政策以至“战争边缘”政策，还企图煽起对我国的敌对情绪，因而预算中这一项国防费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

总的说，我们今年的国家预算，是完全符合我们国家的总任务，总政策，以及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原则和国家制度性质的。这也是我们衡量国家预算的最高尺度。

在小组讨论中，也曾提出一些问题。有的认为，国家预算对科学事业的支出方面，用于科学机构的多，用于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少，因此，形成科学部门人员少，费用多，高等学校人员多而费用少。

有的认为，国家卫生费用中没有提到幼儿园、托儿所的费用问题，现在幼儿园、托儿所少，影响年轻妇女工作和健康，建议设立幼儿教养部，专管幼儿教养工作。

有的认为，规定的公安经费大于司法、检察经费。目前检察部门编制小，建议增加司法、检察经费。

有的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基础差（办学无房，缺少教员，缺乏教材，学生生活苦），经费上照顾不够。牧区学生最好由国家供给，或与地方共同解决，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办学不在多，主要应办好，同时应选择适中地点。

有的认为，公私合营企业产值三十亿元，利润只有八亿，在抵补支出后，还要上缴二亿元，数字太大影响合营企业的发展。

有的对合营企业专户存储的公积金上缴国家预算的作法有意见,认为这样会影响合营企业本身的发展。

有的认为,小学费用下放,由地方自筹解决有困难,这项开支应列入国家预算,光靠地方自筹解决不了问题。小学经费现在不能下放,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不能下放。

我在这里再提一下,这次关于预决算问题,意见非常多,其中特别对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的问题以及小学经费下放问题,争执最大。

其他意见,不再一一详述了。

这次大会通过的预决算的决议很长,诸位想来已经在报上看了。这个决议是由主席团委托预算委员会起草。预算委员会在根据代表们包括委员们的意见着手草拟决议时,涉及各部门的具体问题,首先由财政部长作解答,再征询在场的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如部长、副部长,事实是否这样,你对于批评还有什么意见,一些有关部门的首长要是不在场,便立时电话询问或者在电话上答复,或者亲身赶来答复,或者用书面说明。有时提意见和被提意见的人双方还反复论辩,预算委员会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字之褒,一字之贬”,都不是随意的、空洞的,而是完全符合于事实,无过不及,分寸恰合,做到了大家都认为恰当、满意。因为我也是预算委员之一,所以这种情形,知道很详。

预决算的讨论和决议起草,充分显示了会议的民主精神。代表们当家作主的思想 and 政府工作人员正视缺点、力求改进的迫切心情,都可以从这里清楚见到,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后国家建设加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最后我谈统战问题。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

三大改造已取得决定的胜利，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同样获得重大成就，正在更大的规模上向前发展着。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城乡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面貌和内部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党的基本政策，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战略，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方针。过去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建国六年多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努力奋斗，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快速发展，这也是同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分不开的。

现在由于：（一）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还没有完成，要在全国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需要几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还要有更长的时间；（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任务也没有减轻，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斗争还要继续努力；（三）在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中国人民还须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总的说来，也正如宪法所规定，“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为了适应当前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形势，我认为李维汉部长这次在会议上所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发言，非常重要，非常正确。这个发言显示了在国内阶级关系变化，城乡生产关系根本变化以后，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已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李维汉部长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的这一重

大方针，再一次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这就明确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澄清了一些人以至民主党派成员过去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同时也对民主党派提出新的要求，也可以说新的任务，是一个鼓舞，又是一种鞭策。民主党派在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建设过程中，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党来说，也起到一定的助手作用。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斗争前进中，受到了锻炼，也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必须指出，这一切都是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不能分开的。今天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据我个人的体会，它的精神是在于结合今天新的形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各方面的潜力，共同为社会主义服务，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李维汉部长阐述了党的这一重大方针，更具体地指出，“必须严格地尊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任何党派和团体对其他党派和团体的这种自由和独立，都没有权利加以干涉。”我认为保持民主党派的独立性，使它更好地放手工作，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进一步教育和团结它所联系的群众，共同努力，加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这是非常必要的。但这是不是说，就可以放松党的领导，或者甚至不必要党的领导呢？我认为完全不是的。

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一切事业的核心。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性质的转变，根本问题，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正是有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今天社会主义壮丽的前景。而民主党派也正因为有党的

领导,才在革命建设过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说明今后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更多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始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保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并不意味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改变,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广大人民,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各个战线上共同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同时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以及民主党派相互之间,互相协商,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以减少工作中的困难,改正工作中的缺点,这正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其有利的。

还须附带指出一点,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是否只能有一个党,不容许多党的存在?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实际的需要出发,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并不是命定的只有一个党,只要都为社会主义服务,几个党的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是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的运用。

但是必须注意到,我们党派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决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政治。它们党派间的利害是矛盾的,冲突的,彼此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谁也不能领导谁,偶然的合作,也只是利害暂时的一致,不久又会分裂,法国内阁的经常更替,经常发生内阁危机,显著地说明这点。我们党派间的情况,便与此截然不同,民主党派一贯地承认、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谓互相监督,并不象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在朝的执政党,在野的“反对派”,民主党派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同时承认了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作用。所

以,我们的党派共存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政治,本质各别,不容混淆。

另外,我还要谈到的,就是阶级关系的变化,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并不是说统一战线内部就不再存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它还将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表现出来,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从各人不同的业务,不同的工作上,表现为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的思想作风。正因为这样,李维汉部长指出,在统一战线内部,就需要按照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原则,继续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的一致性,在当前有利条件下,斗争的方法就是说服教育,并且李部长特别着重指出说服教育是当前的主要方法。据我个人的体会,这就是一个思想改造问题。我们的社会飞跃地发展着,我们的思想觉悟,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总还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大家都可能有同样的感觉,这便是我们加速思想改造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我记得周总理提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一般知识分子都感到很大鼓舞,但要真正做到工、农、知识分子联盟,就要知识分子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再拿资产阶级分子来说,全行业合营后,生产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也必须努力自我改造,从思想意识上、实践上,破掉资本主义的一套,立好社会主义的一套,使自己同职工之间,从两重性的工作关系变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因此,教育和学习已成为目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中心工作。省政协现正进一步积极准备大力开展这一工作。我们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这

才能配合客观形势,在国家建设中,在各个不同岗位上,作出一定的贡献。

同志们,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大踏步地向前开展,在进一步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切积极力量,充分发挥各方面的潜力,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对准着科学技术进军,对准着社会主义前进,这就是我们最终胜利的有力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统战工作,发挥统一战线更多更好的作用,我们统战成员人人有分,人人有责,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前进吧!

纪念孙中山*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大会，大家以无比热烈、崇敬的心情，踊跃参加，说明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伟大事业，长久存留在中国人民的忆念中，光辉灿烂，起着永恒的有力的巨大鼓舞作用。旧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国家，孙中山先生诞辰的时期，国际资本主义已经侵入了中国，中国人民在国内外黑暗势力双重压迫之下，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国家地位日益低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诞生了，这正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的第六年，也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初期。他的诞生，象征着一个新的时期即将开始。今天革命的胜利，从流溯源，是与孙中山先生一生艰苦奋斗的成就，密切联系着的。

孙中山先生为了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曾经付出他毕生的精力，他的一生就是革命的一生，他的愿望，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他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他的全部革命斗争中，曾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阻，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但先生越战斗越顽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数十年如一日，这种为国家为人民坚决的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为我们塑造了崇高的典范。

*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成都市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孙中山先生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便组织了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满清、建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日俄战争后，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更提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从此，在同盟会领导之下，中国革命运动，逐步开展，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这完全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是对先生革命，作了一个正确的历史评价。在这段时期内，孙中山先生为了划清思想界限，为革命打下思想的基础，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进行不断斗争；另一方面，组织广泛的革命活动，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革命浪潮随之高涨。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生屡败屡战，从不气馁，辛亥革命是先生革命斗争前一时期中的一个历史总结。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更重要的，是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而推动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觉醒，同时，对于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也起到重大作用，使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日益广泛地、深刻地向前发展。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伟大功勋，就在于此。诚然，辛亥革命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在当时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条件下，这一旧的民主革命，却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整个革命运动进一步的开展，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导，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革命胜利的成果，为北洋军阀所窃夺，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不断加深，先生继续战斗，没有一刻放松他对革命的

努力,又经历了不少次的失败。本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一开始就是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从革命实践中,他越来越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貌,而他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也就越来越鲜明。大家记得,英帝国主义所支持广东“商团”之变,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揭发了帝国主义和商团勾结的阴谋,断然处置,平息叛乱。先生逝世不久前,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亲身到了北京,当时军阀政府为怕开罪帝国主义者,曾劝说先生不要太激烈地反对帝国主义,他的回答是:“假如我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能革命了。”从这些,充分看到先生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决。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扩军备战,力图破坏世界和平,最近英法帝国主义竟悍然采取军事行动,进攻埃及,我们必须本着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志,响应政府号召,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一道,反对英法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美国侵略者还霸占着我们的台湾,为了最后完成我们国家的完全的统一,我们必须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在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几年来过着寄人篱下,俯仰由人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必须沉痛地追思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在求中国自由平等的遗言和他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翻然憬悟,早回到祖国怀抱,这才真正是他们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应有的珍贵献礼。

孙中山先生一生富有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革命家。他以如炬的眼光,经常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他的革命纲领。特别面对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先生紧

随时代前进,放弃了他首先揭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从前一时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接受了人民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力量的朋友。他坚决地指出,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革命,艰苦曲折斗争中的一个巨大的飞跃的转变,是他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他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使它获得新的历史特点。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从而逐步巩固了当时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尔后北伐的胜利进行,打下基础。这对于今天革命的胜利,更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期的历史总结。

大家知道,通过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群众性的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联盟,这是中国第一次的革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两个革命中都曾起着重大的作用。党不久前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就将使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益加巩固扩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同志们,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九十周年,我们在民主革命彻底完成的基础上,社会主义革命又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先生生平渴求实现的理想,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全国人民的努力,已经逐步实现。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要效法孙中山先生“不断前进,百折不挠,学而不倦”的精神,紧密地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同心协力,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共同奋斗。

关于人民陪审员*

我国的人民司法制度，是在新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任务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公共秩序，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障人民权益，几年来起到了显著的作用。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我们的司法工作踏进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向反革命残余继续专政外，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今后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

我们的司法工作，一向是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的。我们的人民司法制度，是广大人民权力的体现。人民陪审员的建立，其根本意义，即在于此。这是一个新的制度，在成都市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才开始重点试行，一九五五年推广及于全市，一九五六年结合市的普选工作进行一次改选。现在成都市共有人民陪审员一千三百七十四人，绝大部分是由人民群众选出，另一部分由机关、团体、企业、工厂推选，任期两年，每年轮值若干天。人民陪审员，除了具备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条件外，还有着广泛的代表性，代表各阶层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参加法院的审判工作，协助法院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制裁了

* 本文是视察成都市司法工作后写的，时间大约在一九五七年春。题目是后加的。

刑事罪犯，保障了人民的正当权益。

我们在这次视察中，曾经分别到市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观审，还举行了人民陪审员座谈会。观审时，我们看到陪审员协助审判长审理案件，态度严肃慎重，对当事人发问也扼要细致，充满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个陪审员在座谈会上说：“我家三代人没有到过法院、衙门，现在我作了陪审员，今天真是人民当家作主了。”这些，都鲜明地反映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感，同时也证明陪审制是一种发扬人民民主的好制度。

由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行未久，我在视察前曾有这样的疑问：人民陪审员会不会受到法院的重视？通过视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当然，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人民陪审员实行之初，有个别审判员认为进行合议，意见歧出，不如一个人搞便利；有的还存在单纯的使用观点，要求多，帮助少，甚至把陪审员作一般干部使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由于领导上的纠正和陪审员在审判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上面这些不正确的看法和作法，也就逐渐改变了。我们这次视察，就亲自看见他们合议的情况，大家根据事实和法律，认真研讨，反复协商，才作出结论，既郑重又协调。在座谈会上，一个陪审员说：我们合议的时候，审判员总是要我们先发表意见，而且大都同意我们的意见，不同意时，再把意见提出来大家商量。又一个陪审员说：审判员对我们是尊重的，诸如：了解案情，审阅文卷，研究判决等，都是大家一同进行。我认为，这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一致性。

据了解，市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陪审员，一般工作都很负责。拿调查案情说，他们不辞劳苦，四出奔跑。有一件离婚案，女方控告她的爱人企图杀害她。一位郊区的女陪审员，为了调

查真象，各处走访，远至离城数十里的双流县也跑去了。结果事情终于弄明白，并不象原告所说那样。结案后，群众称赞法院的调查“硬是深入，硬是清楚。”另一件也是离婚案，双方交朋友一年多，刚结婚一个月，男方提出离婚，女方不愿。城区一位女陪审员为深入调查，曾到离城十多里的地方了解情况，结果知道女的有生理上的缺陷，法院据此判决离婚。她说，人民给了我的任务，一定要认真作好，作一个陪审员必须仔细了解具体情况。这种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审判重在事实，必须调查研究，详细占有材料，然后依据法律，处理案件，才能分寸恰当；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服，使群众满意，发挥人民司法的教育作用。古书上说：“廷尉天下之平”。作为剥削阶级的廷尉，是不能得“天下之平”的。今天的人民司法的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熟悉民间情况，才真正是“天下之平”。

人民陪审员，不仅对审判工作起了有力的协助作用，有的还能通过审判工作，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例如一个地区，曾经在一个短时间内接连有七个离婚案。陪审员找到当地调解委员会、邻居、群众，详细了解情况，再同审判员分析研究，知道都是由于生活有些困难，加上法律观念不强，夫妇间稍有争执，便告到法院。据此，陪审员建议选择一案就地公审，进行帮助、教育。审理终结，认为条件不够，不能离婚。当时参加的群众二、三百人，大家都认为处理恰当，其他六案也自动撤回。

此外，人民陪审员轮值回去后，利用各种机会，针对现实问题，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还能起到增强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作用。过去一些人认为陪审员文化水平低、缺乏法律素养，因而否定或轻视陪审制，这是不对的。

为了进一步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我提出下列一些意见：一、审判员对陪审员必须彻底消除单纯使用观点，要用多种多样的具体方式帮助陪审员，如：讲授应具备的法律知识，组织旁听典型案件，组织经验交流会等，不断提高陪审员的业务能力。二、除轮值时间之外，法院和陪审员应保持经常联系，使陪审员能更多地了解情况，并和法院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三、陪审员平时得到的文件较少，应适当增发，供学习参考之用。四、轮值时间要从实际出发，如由机关、工厂推选的陪审员，都有固定的工作岗位，他们的轮值时间可以灵活运用，适当安排，以免影响本职工作。五、有些陪审员是领导干部，兼职过多，往往不能参加陪审工作，应当给予适当的调整。

我们的人民司法工作正在发展，大力开展人民律师的业务，也是一项新的、必需的工作。成都市的法律顾问处，是在去年六月成立的，虽然不到一年，由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加上从业人员的努力，在摸索前进中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同时，群众对于这项工作的需要，也得到反映。当前，我国的成文法典尚未臻于完备，因此，即使是文化较高的人，对于一些有关法律的问题，也感到需要得到帮助。法律顾问处成立以来，不少群众还未到办公时间，即往等候，每天都很拥挤。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绵阳、广元等地，也有来请求写申诉、控告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阿坝、凉山等地，也有写信来询问有关法律问题的。这说明，开展人民律师业务，确有必要。另一方面，人民律师的工作，对于法院审判工作质量的提高也有很大帮助；一些不能成立的案件，通过法律顾问处的解释、说服，中止了起诉，从而减轻了审判工作的负担，并使群众避免了由于涉讼而受到的时间上、经济上不必要

的损失。

目前的问题,是人民律师本身的业务水平还不够高,不能完全适应群众的要求;而旧社会律师给人的不良印象还残存着,也使得个别的律师不安心工作。因此,要有领导地通过学习,提高人民律师的政治水平、业务水平;同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人民律师的作用,扩大人民律师的队伍,组成律师协会,进一步开展人民律师业务,配合人民陪审员制度,以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使我们的司法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起到更多更好的作用。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与 扩大民主生活*

我这次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会议开幕以前,我们全体与会人员还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听到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大家感到十分兴奋和鼓舞。今天,我把这次全体会议的主要内容和精神,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向大会作一个传达,不正确的地方,由我个人负责。

政协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家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在各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作了充分准备打下了良好基础,和在周总理访问了欧、亚十一个国家以后的重要时期召开的。因此,这次会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实际上从二月二十五日便已开始,至三月二十日才闭幕,总共开了二十四天。出席会议的委员,包括新增补的委员共六百二十二,比历次会议都要多,加上列席的二百八十一人,总计九百零三人,说明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不断地加强和扩大。这次会议中发言的踊跃热烈也是空前的。在大会讨论中发言的有四百零六人次,

* 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四川省政协传达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精神的报告。
题目是后加的。

占出席、列席人员的百分之四十四（上次会议只占百分之二十二），发言内容一般很充实而具体，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肯定成绩，揭出缺点，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统一战线等，说明大家对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切关怀，充分表现了积极负责的态度；尤其是小组讨论非常认真，从小组讨论的内容与各委员在讨论进行中的互相争辩，思想交锋，充分说明这次会议真正做到了反复协商，发扬了高度的民主精神，让各阶级阶层的人民都有过问“国家大事”的机会。这是中国人民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良制度下的政治生活中的特点。这次会议提案二百八十七件，超过上次会议的一倍以上。周总理在闭幕时讲话说，发言同提案整理后，将交有关部门研究，对于提出的批评尤应负责处理。如不满意，发言人还可以继续追问，与事实有出入者解释说明，批评对的就要接受。又说，这次发言、提案甚多，问题提出来了，批评也提出来了，证明大家都能从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出发。过去有人说，政协开会时轰轰烈烈，闭会后冷冷清清，今后对政协委员要作实际安排，个个有工作，政协本身要更好地加强组织。这次会议，使大家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极其伟大的，对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也是非常正确的。

（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国家已经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产关系的改变，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这是当前国内形势最根本的一个变化，也即是说，过渡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上解决了，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国内主要矛盾既然发生了变化，因而我们整个国家的任

务也要适应这一变化。不消说，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一个专政的机关，可是它的职能已起一定的变化，就是作为专政机关的作用逐渐缩小，民主的范围逐渐地扩大。毛主席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他说：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办法也不同。过去我们常常谈要分清敌我，要分清是非。要分清敌我，就是要分清什么是敌人，什么是友人；要分清是非，就是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内部问题是是非问题。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又说：专政是为了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谁实行专政呢？就是要人民去实行专政，阶级去实行专政。阶级对阶级专政，就要民主集中制，经过人民的政府去实行对敌人的专政。说到人民内部范围的问题，就不是专政问题，人民不向人民自己专政，而是民主的问题。周总理也说：国内的对敌斗争结束，大规模群众的阶级斗争结束，或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出来了，所以要重视内部矛盾。但这不是说，国内没有敌我矛盾了，还有反革命分子的暗藏活动，而且我们作得不好，国外的敌人就要和他们联合起来闹；也不是说，内部矛盾就没有阶级矛盾，还包括着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矛盾，只不是对抗的，这些矛盾解决得不好，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不但可能助长敌我矛盾，更坏的是转化为敌我矛盾，如匈牙利事件。我们过去的历史证明，能够把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所以，只要我们处理得好，也可以避免矛盾向坏的方面转化。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知道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存在的。矛盾的存在并不是坏事，它是前进中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出现的，就

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问题是要不断地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社会就是在不断克服矛盾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信任群众,依靠群众,遵循群众路线,通过民主方式,是完全可以适当解决的,从而进一步达到更好的团结。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把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作为目前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是非常正确而必需的,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不断加强和扩大,也是体现了这一点。这次会议的新的精神就是扩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是全国六亿人民共同的伟大目标,必须在发扬民主精神和扩大民主生活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和团结一切可能动员和团结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和进一步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在我们一些国家机关中,也还存在着不少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从而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发扬民主,扩大民主,正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正因为我们是人民民主政权,是社会主义制度,才敢于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并能够克服官僚主义。而克服官僚主义又正是消除内部矛盾的最好方法。周总理还指出:全国人民,各阶层的人,都应该有这个自觉,自觉的防止矛盾向坏的方面转化。只有正确的分析,正确的对待处理,才能使政治生活顺利、正常的前进,才能使对抗性的矛盾减少。所以大家要从团结出发,通过协商和批评达到进一步团结。不管哪一阶层,哪一部门,都要把自己放在里面,而且从自己开始作起,搞好团结,不要等待别人的推动。不论上下级,部门间,

党群间，都要自己采取积极的态度。一切意见都自己积极地说出来，而不要等待对方的积极；因为改造社会，人人有责。这样，就很容易清楚敌我和人民内部的界限，把两者区别开。……问题摆开谈，正确的一方面自然伸张，坏的一方面或反革命的一面，必然萎缩。我们都需要积极起来。正确处理内部矛盾是长期艰巨的工作，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就可以作好。我的体会：只要我们事事从六万万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依照周总理的指示，大家采取积极态度，有怀疑就问，有意见就提，有问题就协商，有错误就改正。这样，我们人民内部的关系就可以在克服矛盾的过程中坚强地团结前进。

这里，应该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向是民主与专政辩证地密切结合着的，它是我们国家生活的两个方面，而又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方面对敌人专政，同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推动着国家生活的健康发展，因而保障了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在各项运动中，各个建设战线上取得了不断的胜利和成就。有些人看见党在今天提出扩大民主，便认为过去没有民主，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我们要注意“扩大”两个字，就是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我们专政的对象减少了，民主的范围适当的扩大了，而不是今天以前，我们就没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逐步向前扩展的，我们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深刻理解这一问题。

还有值得更加注意的：自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一些人的思想上不免有些波动，因而在民主问题上也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认为波、匈事件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是民主不够，想搞大民主，不要专政，也不要集中，这才痛快，这才是真正民主。这种把

专政与民主,民主与集中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我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诚然,匈牙利过去的领导在不善于运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人民民主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在革命专政的问题上也犯了许多错误,既没有搞好民主,也没有搞好专政。但是如果由此而就主张搞大民主,以至放弃专政,那就会犯原则上的错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最根本的原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是有绝大危害的。要知道,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实质都是阶级的专政,问题只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专政。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分子的专政。没有这样的专政,要想保障革命胜利的成果,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办得到的吗?毛主席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地指示了我们说:民主是有领导的,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专政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从古以来,搞大民主运动都是对付敌对阶级的。民主是手段,马列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改变人民的生活问题,民主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服务的。毛主席这些指示,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应当逐步扩大,并且正在逐步扩大着。人民取得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七年以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正以辛勤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战斗前进,要求扩大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这是正确的。党和人民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一年以来,在政治上,提出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扩大国家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的

决定。这些，都是具体的说明。毛主席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也再三着重地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可以通过例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政协等，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政府进行监督，对政府的工作进行检查，提出批评和建议。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也可以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党还特别鼓励由下而上的批评和揭露。这说明党和人民政府的措施与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一致的。毛主席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还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作了明确的指示。有人提到长期共存的“长期”有多长？他说：共产党有多长，民主党派也就有多长，共产党有多长寿命，民主党派也就有多长寿命。郭老（沫若）说无党派寿命最长。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的。我们希望这一天不早也不迟，太早不行，太迟也不必要。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怎样监督？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使我们提高了认识，受到了最大的鼓舞。

我们一方面扩大民主，一方面又必须继续加强专政。由于党的肃反政策的正确，加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反革命失去了他的社会基础，分化瓦解的趋势愈加明显，残余反革命分子已是不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反革命分子已经完全肃清，反革命已经没有了，因此，必须继续加强专政，贯彻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革命专政的巩固正是为扩大民主创造更好的条件。周总理这次访问波兰在华沙群众大会上说得好：“只有坚决地对劳动人民的敌人实行革命的专政，才能保证最广泛的民主；只有依靠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才能够对敌人实行最有效的专政；而只有把革命的专政和最广泛的人民民

主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自然，由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专政的对象已经缩小了，民主的范围扩大了，不能体会这一点，就不能体会我们国家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但不能因此便认为专政不必要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密切联系的。总之，我们既要反对只注意专政而忽视了民主；同时也要反对只注意扩大民主而忽视了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特别是在人民内部搞大民主就会混淆了敌我是非的界限，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这一点，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起来。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内民主生活的扩大，为了更紧密地团结全国广大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更有效地同社会主义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健全法制，加强法律教育，使我们干部和人民群众严格遵守法制，已成为今后国家工作的重要一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人民群众中和国家工作人员中，一般说来，遵守法制的精神是不够坚强的，为着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国家正在加强法制工作，从事各项法规的草拟，使我们国家的法制更加完备起来。董必武院长指出，要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人人遵守法律，人人依法办事，充分发挥人民法制的作用，这就更有利于我们在扩大民主的基础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

这里，我还要着重补充一点，就是随着人民民主生活的扩大，进一步加强学习，更显得特别重要。客观形势是飞跃的发展，放松学习是会掉队的，是与现实生活不相适应的，看问题，处理问题，是会发生错误的。归根到底，这还是思想改造问题。马克

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政协章程七项准则中的第七项也规定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这是迫切的需要。改造思想是长期的，同时也是刻不容缓的。“长期”的涵义，一方面说明思想改造不是那么容易，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一方面也说明需要长期不断的进行改造。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昭示大家：有人说，不是思想改造了吗？我看还要改造，可能还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几个五年计划以后，是不是可以不改造了呢？那时新问题又出来了，还是要改造。毛主席还指出，要慢慢造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空气。这次会议的政治决议的第四项也提出要“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并且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我认为这些指示都是非常正确的。自然，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离开书本，但是只靠书本还不够，这可能流于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不好的。我们必须更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用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再从实践巩固和加深我们对于理论的认识，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

(二)大力展开增产节约运动

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这是我们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各个生产战线上以忘我的劳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计划的规定，工业总产值在五年内将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三，而去年年度计划中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原计划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一些部门的计划产量还有

超过。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计划规定要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预计亦可超额完成。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全国人民和职工的生活，均有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去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更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作为国民经济两大部门的工、农业，受到严酷的摧残，非常落后，虽然解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仍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提出：“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目前我国城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的时候，发展生产有了最有利的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善于充分地利用这一条件。进一步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便是在生产关系改变的基础上，推动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李富春副总理在这次会议所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中指出：“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基本方针。”为了发展生产，首先必须厉行节约。我们的节约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它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的再生产，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福利。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主要依靠内部的积累。党和政府一贯地号召增产节约，也正由于全国人民响应了这一号召，才取得了今天国家建设各方面这样伟大的成就。现在我们正在争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和超额完成，并进而为明年即将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坚实的基础，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模更加宏大，要求五年内工、农业总产值比今年的计划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增长一倍左右，生产资料工业的增长还要快些。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间，工业总产值连同手工业在内，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重

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将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设备自给率将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由于工业建设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我们所需要的资金也就非常巨大，这就不能不要求全国人民继续发扬勤俭建国的精神，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增大积累。这是国家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

有的人把增产节约运动认为是一阵风，基本上不重视，这显然是不对的；有的人又把节约看做是为了解决某些临时的困难，这也是不对的。增产节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还有一些人认为潜力已经挖尽了，节约已经到顶了，再没有什么搞头，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看增产节约初步展开以后，报纸所报道的一些事实，说明在节约的基础上增加生产，还有着很大的可能。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今年一、二月份，重庆市第一机械系统的职工，在改进技术、设计、节约金属上克服了材料供应不足的困难，生产了许多产品，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几，单拿钢来说，钢铁工人通过提高质量，节约原料，增加生产，一、二月份共给国家多生产了五千吨钢材。这就说明了问题。还有的认为我们的机关既不是生产单位，又不是理财部门，也没有什么搞头，实际上，非生产单位、理财部门，在办公用具、日常开支等方面，不是还存在着一些浪费现象吗？总之，无论在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人民团体任何方面，可能节约的地方，都是有的。又有一些人说，反对铺张浪费又来了，不是反过了吗？共产党就是那一套，几个月后又没有事了。毛主席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驳斥了这一种说法，他说：这话真的吗？我看也有些真。一九五二年搞过三反运动，全面反对铺张浪费。前年提倡节约，主要是减少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降低标准，节约了二十多亿，成绩很大，当然也有些节约得不恰当，不好，降低了质量，至于机关、

团体、学校、企业部门，这些方面一般都没有搞节约。现在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开展增产节约，比较全面一点。打比喻说：洗脸是怎样的？洗脸至少一天一次。为什么脸要天天洗，不是一个礼拜一次，无非是想尊容漂亮一点，无论共产党非共产党都是一样的要天天洗脸的，也是自古就有的。我们提倡增产节约，就象洗脸一样，人是高级动物，就是经常要洗脸的。共产党人、民主党派人士、工人、农民、包括六亿中国人民都要提倡增产节约。毛主席这些话生动地说明，必须把增产节约作为根本思想牢固地树立起来。只要真正思想上认识到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把它贯彻到各个单位、各项工作中，包括人力的节约，物力的节约，财力的节约，我想这对于我们工业化资金的积累，人力的发挥，是会起到极其巨大的作用的。

为了贯彻增产节约运动，我们首先还要响应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号召，毛主席号召全国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现象。我们中国人民一向富有艰苦朴素的传统精神，作为国家干部，作为统一战线的成员，尤应躬行实践，以身作则，并对所联系的群众和在广大人民中广泛宣传，使这一运动成为规模壮阔的群众性的运动，从而树立一种崇尚节约的社会风气。陈云副总理在这次大会上关于增产节约问题的发言中说得好：“人口众多，消费量大，这是我国经济生活方面的一种困难。但是也正因为人口众多的缘故，只要每个人节约出一点，就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这不仅适用于消费方面，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只要每个人在工作中节约出一点，就大大有助于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江西省的山区建设和林业建设*

我们于一月二日离京，乘京沪车南下，四日下午到达南昌，在江西停留了十天，于十四日回到北京，将近两个星期。

在南昌，我们参加了江西省农林垦殖系统的群英大会。我在大会上代表部讲了话、赠送了锦旗，受到与会同志的热情欢迎。我们参加了三天大会，即开始参观。先后参观了江西省农林垦殖展览会、农林垦殖机械制造厂、林业科学研究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和云山分校、樟树贮木场、云山国营综合垦殖场及所属燕山分场。从云山参观回南昌后，江西省农林垦殖所负责同志又把江西省的林业工作情况，向我们作了全面的汇报。通过以上活动，使我受到教育，得到鼓舞。

我这次南下，把了解林业建设情况、学习林业知识作为重点。列车离开北京以后，我就注意沿途的植树造林的情况。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二千三百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沿铁路两旁大都栽了树，铁路附近的荒山旷地大都造了林，其中有些地段是林粮间作，树木长得很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津浦路沿线在旧中国是一片荒凉，除了稀稀落落的几棵行道树以外，看不到树林；这次去看，情况完全变了，铁路两旁，视线

* 一九六〇年二月参观江西省山区后在林业部的报告。题目是后加的。

所及的远山、近山、丘陵、平原，大都造了林。从济南到泰安一些石山上也栽上了树。沧州到德州的一段，树栽得非常整齐，铁路两旁各栽有一行约一丈多高的柏树，里面又栽了若干行小树。这些树看来栽上不久，许多老乡还正在推车运苗继续栽种。可以想象，再过若干年，这些树木长起来了，从北京到南昌这二千三百多公里的铁路线，将是一条美丽的绿色长城，人们将在万绿丛中爽心悦目地度过愉快的旅行生活。

到南昌以后，我注意山区的建设、特别是林业建设。从群英大会的报告、发言和一系列的参观中，在我的脑中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江西省的山区建设，包括林业建设在内，方向正确，干劲很足，成绩巨大，前途美好。

我说江西省山区建设的方向正确，是从下述四个方面来看的：

第一、江西省委善于结合地方特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山区生产建设的方针。江西省的特点是：山区辽阔，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生产很低。江西省委把江西的经济地理概括为两句话：“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这些辽阔的山区，又大都是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觉悟高，听党的话，一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而奋斗。但因为曾经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疯狂屠杀，人口大为减少。据省人委的调查，江西全省人口，解放时仅及1927年的一半，山区的人口减少得更多，以至土地荒芜，生产很低，生活很苦。解放以后，虽然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相比，还是很不够的。因而仅仅依靠山区人民的力量，想把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区开发出来，建设起来，是有困难的。针对这种特点，江西省委抽调了大批干部上

山，建立全民所有制的综合垦殖场，与山区人民一道，向广阔山区进行历史的全面大进军。这就使山区和城市的社会主义建设，得以互相支援，比翼齐飞。

第二、江西省山区建设的组织形式，是以国营综合垦殖场为核心，以垦殖场与人民公社的紧密结合为基础。全省现已建立总场二百零九个，分场四百六十六个，拥有职工一百多万人。被吸收参加国营垦殖场的农民有九十三万人。两种所有制并存，在生产建设上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在财务收支上各自核算，各计盈亏。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一、由于国营垦殖场是以下放干部为骨干组成的，政治上、组织上比较坚强和巩固，能够担当起艰巨的战斗任务。二、由于垦殖场是全民所有制的，因而易于全面贯彻党的开发和建设山区的各项方针政策，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江西省委提出了奋斗目标，要把每一个国营综合垦殖场都建设成为强大的商品生产基地。这对于支援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垦殖场和人民公社紧密联系，以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带动山区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可以加速山区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第三、江西省委在山区创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大量培养了山区建设人才。现有总校一所，分校八十八所，附属劳动技术学校十四所，共有学生五万五千多名。各个学校都划有一定的生产基地，学农的搞农业生产，学林的搞林业生产，学什么做什么，边学边做，取得了学习、生产双丰收。现在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学校自给有余。这样做好处很多：首先，国家不用花多少钱，而能培养出大量的建设人才；其次，广大工农子弟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不仅在现阶段为山区建设增添了

强大的生产突击队，而且为将来日益发展的山区建设源源不断地供给成千上万的技术干部。

第四、江西省的山区建设，成功地执行了全面规划、综合经营的方针。所有的国营垦殖场，都是综合性的企业，农、林、牧、副、渔、工六业并举。如：山区以用材林为主，同时搞好经济林和农、牧、副、渔、工等生产；丘陵地区以经济林或农业为主，同时搞好牧、副、渔、工等生产；平原、滨湖地区以农业或渔业为主，同时搞好其他生产。正因为农、林、牧、副、渔、工六业并举，所以各项生产就有极大可能互相配合，互相利用，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从而大大加速山区建设的发展。

事实告诉我们，江西省的山区建设，是从艰苦的战斗中发展起来的。当一九五七年冬季国营垦殖场创立之初，五万下放干部面对的是大片荒山旷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和山区人民一道，向大自然宣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他们开山劈岭，披荆斩棘，依靠国家的支援，运用自己的双手，盖房屋，修道路，垦荒地，建工厂，筑水坝，砍木材，种庄稼，搞畜牧，开学校，设医院，等等，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广大荒无人烟的山区，面目为之焕然一新。只举我们去的云山国营垦殖场，就足以说明情况。这里原来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建场两年，他们作了这样多的事情：

盖起了十万平方米的房屋。有办公楼，有职工宿舍，有设备较好的招待所，有文化馆，有银行，有邮电局。南昌的公共汽车直接通到这个具有现代城市雏形的地方。

修筑了公路五十余公里，简易公路及田间大道一百五十余

公里，各种木轨平车道九十公里。我们参观燕山分场、伐木场、劳动大学云山分校和工厂、水坝，都是坐着汽车去的。

办起了许多工厂。其中木材综合利用工厂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正在兴建的纤维板厂、松香厂、烤胶厂，都是洋法生产的，今年上半年即可建成投入生产。

林业方面，两年来生产木材六万多立方米，茅竹六十多万根，造林近六万亩。

农副业方面，两年来耕地面积扩大，一九五九年生产粮食一千六百多万斤，养猪六千多头，羊、兔各一千多头，家禽五万多只。

文教卫生方面，设立一所劳动大学分校，三所中学，三十所小学，一个科学研究所，七个动植物园，三个气象站，一所总医院、七所分医院。

据江西省人委负责同志告诉我们，云山国营垦殖场，在江西省的国营垦殖场中是属于第二流的，井冈山、大茅山、九连山、德胜关等垦殖场，比这里还好，可见江西省山区面貌的变化是何等巨大。

江西省山区建设的发展，不仅在经济上、文化上获得巨大的成就，同时在政治上也是大丰收。由于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由于山区革命传统的影响，由于垦殖场和劳动大学是集体的劳动和学习，因而广大干部和青年，在思想上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改造。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不怕艰难困苦，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在自己的岗位上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我在南昌参加了江西省民革召开的座谈会，一个刚从山区回来的下放干部在会上说，他们是人在山，心在山，红在山，专在山。我在云山看见一些年轻的

上海姑娘在畜牧场作饲养员，不怕脏，不怕臭，工作得很起劲。在南昌郊区棉岭科研所，一个杭州知识青年，精心地研究养兔，据说已经取得成绩。一支庞大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队伍，已在江西山区逐步培养起来，因而社会风气也有很大的转变。过去山区的人想到平原，平原的人想到城市；现在变了，不仅山区的人热爱山区，就连一向生活在城市的人也向往山区。正如江西省群众所说，山变、人变、风俗变。

随着山区生产建设的发展，山区人民的收入有了较大增加，生活也大大改善。我们到过的燕山分场有个百货商店，每天平均营业额一千多元，到夏收、秋收分配时期和节日，每天营业额两千多元。毫无疑问，他们的生产将越来越高，生活也将越过越好。

下面，谈一些林业方面的情况和体会。

首先，党在林区生产上提出的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江西省得到认真的贯彻。

前面说过，江西省委规划，山区以材林为主，同时搞好经济林和农、牧、副、渔、工等生产。江西省委还要求，必须把当年性生产和多年性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以当年性生产来支持多年性生产，以短期收入来促进长期生产的发展。我们参观的垦殖场都是按这些方针和要求，并取得显著成效的。云山国营垦殖场一九五九年生产木炭四百六十多万斤，每百斤售价四元；生产杂木棍一百七十多万根，每根售价一角七分；生产小山竹八十多万斤，每百斤售价五至七元；还给纺织厂制作络纱管，利用废竹篾编土筐。我们算算，该有多大收入。所以云山垦殖场的群众说：“砍树要栽树，树是摇钱树；靠山要养山，山是聚宝盆。”随着当年

性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巨大，就有力地支援了林业生产建设的高速度发展。

其次，党提出的林业上的基地化、林场化、丰产化，从江西省的具体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

江西省负责同志指出：我国的森林资源不是很多的，江西省的森林资源也不是很多的。在全省林区建立永久性林业基地的问题，已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又提出：在拥有用材林的地区，建立林业基地，供应商品木材；在所有缺木材的地区，则要求在十至十五年内作到自给有余。各专区、县正在订立具体规划。在省人委指示的原则下，江西省农林垦殖所提出了林业的具体任务：以实现大地园林化为目标，以建立用材林基地为中心，大搞速生丰产，大搞油料木本化。要求各国营垦殖场、农场，和山区人民一道，从山区到丘陵地区，建成数以万计的林业基地，把江西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区形成林业基地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现林业上的基地化、林场化、丰产化，既反映了地方的迫切要求，又符合实际情况。

第三、木材的综合利用，蕴藏着无穷的潜力，具有极其广大的发展前途。

江西省各国营垦殖场对木材的综合利用，特别是林产化学工业发展得非常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省新建许多工厂，大部分是化学工业和木材加工工业。云山垦殖场的林产工业，对于木材以至野生植物的综合利用，进行了广泛而精心的研究，制造出许多新产品。我们参观了农林垦殖展览会，展出的新产品更是洋洋大观。例如，松树的综合利用，制造出四十种不同的产品。再继续搞上五年、十年，更不知将制出多少新东西来。林业

工业的前途是广大的、美好的。

第四、开展林木速生丰产运动，贯彻林业六项基本措施，是高速发展林业资源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去江西以前，我从文件上、从同志们的讲话中，已经懂得了林木速生丰产运动和林业六项基本措施的重要性。但只停留在理论上、概念上。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模模糊糊的。这次到江西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参观，对这个重大措施，有了具体的、深刻的理解，并且受到极大的鼓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林科所在棉岭大坑搞的三十多亩速生丰产林。由于全面地贯彻了林业六项基本措施，一年生的（一九五九年栽的）杉树，高度一般都超过了国家要求的标准——八十公分，其中许多长到了一米三，我站在树旁，同我的胸膛一般高。同一个山头，群众营造的四年生的杉树，因为没有贯彻林业六项基本措施，被灌木、杂株所笼罩，几乎看不见；用尺一量，只有四十公分高。这两处都拍了照。同一山头，同一树种，两种措施，两种结果，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种生动的事实告诉我们：开展林木速生丰产运动是正确的，林业六项基本措施是有效的（当然要注意因地制宜）。古话说：“前人栽树，后人遮阴。”这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了。

学习生活和政治协商*

学习是属于教育范围,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各界人民的思想认识,使大家都能在党的领导下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学习本身不是政治,而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学习与政治活动两者,在性质上既不能混同,在职能上也不能相互代替。不过,依据我长期实践的体验,在学习的过程中,利用其可能利用的条件,去起一些政治协商的作用,却是可取的,也是有益的。

为什么说可取的?理由有两条:

第一是需要。政治协商性质的会议,事实上不能经常召开,因此,每次会议只能集中讨论几个重大的问题。同时,参加会议的人数有限,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也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利用其他形式去加强。现在,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比较经常的学习会,如果有意识地利用起来,是可以起到一些政治协商作用的。

第二是可能。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学习会,每周都开一次到两次,参加学习的人比较多,并在各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别是现阶段的学习,普遍采取“神仙会”的形式,不拘题目,大家自由发表意见,有啥说啥。在这种气氛下反映出来的情况,不仅范

*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题目是后加的。

围广泛，而且往往内容真实。政协部门把反映出来的情况和问题，集中起来，加以分析，认为有参考价值的就提供党和政府参考，认为需要讨论的就提交群众讨论，统一认识。这样，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政治协商的作用。

为什么说是有益的？也有两条理由。

第一、利用学习生活去起政治协商的作用，可以活跃民主生活，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从而有利于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在学习会上，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同时对不同意见展开争论，摆事实，讲道理，把情况弄清楚，把问题弄明确，这样，将使正确的东西得到肯定而巩固；片面的、不正确的东西，由于经过讨论获得全面正确的认识而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建设性的意见，由于经过反映而得到重视或采用。这都是有益的。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民革的一次会上，有位同志是大学教授，他对我们国家几年来的高等教育工作反映了一些缺点，言下深感忧虑。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会上另一位同志说，这是事情的一面，我们再来看看成绩的一面如何。接着有几位同志发了言，举出许多事实，说明解放后大学生在数量上有巨大的增长，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也有显著的功效。过去的大学生大都只有一些书本知识，能说不能行，今天的大学生学以致用，许多毕业设计，真枪实弹，真正作出东西来。经过这番讨论，大家得到了全面的认识。由此我得到启发，在学习会上展开民主的讨论，人们要说的话说了，不通的问题通了，就心情舒畅，活力充沛，更好地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党在这样民主的基础上，去处理各界人民的内部矛盾，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也就必然能够更好地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力量。

第二、利用学习生活去起政治协商的作用,可以更多地集中各界人民的情况和意见,供党和政府检查政策、改进工作的参考。学习主要是为了提高思想认识。因此,学习会上反映出来的必然大都属于思想领域的问题。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反映某一部分群众的意见或某个部门的实际经验的。这种意见和经验,可能对党和政府检查政策、措施,改进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记得三个月前,在民革的学习会上,有一位年老的同志谈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华北各省过去大量种谷子(小米),因为谷子的营养丰富,人们吃了很顶事;谷子秆喂牲口,膘肥体壮,抗寒能力很强。近些年来,有的地区改变了这个历史传统,认为谷子是低产作物(其实不一定),不叫种了,也就种得少了。这样一来,农民吃得不习惯。同时牲口的饲料差了,耕起地来没有劲,抗寒能力也大大减弱,这对农业生产不利。他希望民革领导上向党反映这个意见。我知道,他是在山东农村生长的,对华北农业生产情况有一些了解。他所提的意见,无论是否合乎科学,但可能反映华北农村一部分人的看法和要求。如果反映给政府,总会有些用处,至少会引起农业部门的注意。从这里我联想到,如果所有参加学习的人士,都能利用学习机会,从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角度,广泛反映各种情况,提出意见,供党和政府参考,岂不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很大好处吗。

但是,我们一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往往把学习和政治活动的界限分得太严,认为学习是学习,政治活动是政治活动,各了各,河水不犯井水。遇到有人反映情况和问题,也往往一推二提。所谓“推”,就是推给其他部门,认为这些实际问题不在学习范围之内。所谓“提”,就是把实际问

题提到思想原则上去看，甚至把客观存在的事实，说成是人们思想有问题，用概念和道理去解决。这种一推二提的办法，是不好的，既不利于发扬民主，也不利于学习。

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的调整，需要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去完成。党号召我们进一步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加强团结，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也希望我们多反映情况和意见，帮助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克服困难，以便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这种新形势和新任务之下，我们统一战线的每个成员，都应当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因此，我想到，可否利用学习生活去起一些政治协商的作用，使我们的学习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这种想法，究竟对不对，请同志们指正。

林业工作的情况、 问题和改进措施*

几年来,林业建设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经验,当然也存在着缺点;目前,随着整个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林业建设也出现了新的局面。下面,我着重汇报一些森林资源情况、造林、森林经营和木材生产等四个问题。

一、森林资源情况

我国现有森林面积约十四亿多亩(其中包括竹林二千七百万亩,油桐、油茶等经济林六千三百多万亩),木材总蓄积量六十多亿立方米。这些森林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和完达山脉;西南地区的大渡河、岷江、雅砻江、南盘江流域;西北地区的天山、阿尔泰山、祁连山和秦岭山脉;南方的粤、桂、湘、鄂、赣、闽、浙、皖、黔等九省的一些地区。在这些森林当中,除了一部分经济林、竹林、杉木林是人工培植的、林权属集体所有以外,其他都是天然林,林权绝大部分为国有。

* 一九六三年四月代表林业部向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的汇报。

我国森林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森林面积小、蓄积量少。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0%，每人平均森林面积两亩多，每人平均森林蓄积量九立方米。这个特点，不仅是我国广大地区易于造成旱涝灾害和水土流失的原因，也是我国木材和林产品供应难以满足需要的问题所在。

第二、资源分布不均。现有森林绝大部分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四川、云南五省、区。这五个省、区的森林蓄积量占全国总蓄积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南方九省、区的森林蓄积量占全国总蓄积量的百分之十五。其他省、区森林资源都很少，有的省如山东、江苏几乎没有森林。这种分布状况，一方面形成了木材供应在地区上的不平衡，远道运输木材的现象，另一方面也给少林、缺林地区提出了更为严重的造林任务。

第三、现有森林，大部分都在偏远地区、深山和高山地区。林区人口稀少，有的根本没有人烟，没有交通道路。因此，要开发利用这些森林，不仅各种物资、设备都要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远道运进林区，而且还必须在林区平地起家，这就给我们开发建设林区提出了相当艰巨的任务。这几年，由于对偏远林区开发不够，在木材需要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区就不能不出现过量采伐的现象。

第四、现有森林绝大部分已成为成熟林或过熟林，年生长量很低。大、小兴安岭林区成熟林和过熟林约占百分之七十五，长白山林区约占百分之六十，四川、云南林区约占百分之八十。这些成熟林和过熟林，如不及时采伐利用，将逐渐老死腐朽在山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速开发利用和更新这些森林。由于成、过熟林多，森林生长率很低，全国森林平均生长率只有百分之一

点四六。

总之，森林少，分布不均，成、过熟林多，生长量低，地处偏远，开发不容易，这就是我国森林的基本概况。这种状况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林业建设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我们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后，还必须继续进行艰巨的工作。

二、关于造林问题

积极发展造林事业，是改变我国的自然面貌和经济面貌，保证农业丰收，满足各方面对木材和林产品需要的根本措施。

十几年来，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造林运动，造林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国造林面积，目前保存下来的，共约一亿亩左右，其中国营造林二千五百多万亩，社队集体造林七千五百多万亩。与此同时，森林采伐后更新起来可望成林的面积约有一千万亩。

造林事业的迅速发展，使不少地区的自然面貌和经济面貌大为改观，并且初步形成了新的用材林基地。例如广东省雷州半岛北部，从一九五五年以来国营造林四十八万亩，其中大部分已郁闭成林，初步形成了新的用材林基地。又如山西雁北风沙地区，营造七十多万亩杨树林，都已高达三、四米，已有一百五十万亩农田直接受到保护，减免了风沙的危害，农田产量显著提高。内蒙古赤峰市共营造防护林五十多万亩，全市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由过去平均亩产五、六十斤到一百五十斤，群众普遍反

映：林带就是“粮带”。再如广东省电白县，八年来造林四十多万亩，配合水利建设，初步控制了三十多万亩的水土流失区，并使沿海常受台风侵袭的十五万亩农田得到保护，为农业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县过去年年缺粮二千多万斤，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已经变成余粮县，而且许多大队实现了烧柴、用材自给或有余。

随着造林事业的发展，国营林场和社队办林场，也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解放时，我们只接管了三十几个国营林场，目前全国有国营造林林场二千一百多个（其中机械造林林场一百一十三个），还有社队林场和专业队一万一千多个。这些林场在建设林业基地和发展山区经济方面，起了带头、骨干和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造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高了对林业事业的认识。所有这些，都为今后林业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亲身体会到造林的好处，造林的积极性更大了。目前北方各地正在积极开展造林运动；南方各省、区早在春节前后就开始了。截止到三月十五日，据十七个省、区不完全统计，已造林一千万亩左右，而且质量一般比过去好。

回顾十三年来的造林工作，我们有哪些经验教训呢？通过初步检查总结，大体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林业生产具有长期性、连续性的特点，它从采种育苗、植树造林、抚育保护到采伐利用，然后再进行更新造林，一般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甚至百八十年；同时从造林到采伐，每一道工序都是互相促进、密切结合的，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在计划和投资上、生产部署上，必须统筹兼顾，

全面安排,长期打算,实行造林与抚育并重,采伐与更新结合;而且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和稳定的林业机构,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才能造一片,成一片,不断扩大森林资源。

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研究、掌握不够,一方面,没能按照林业生产的特点及时解决造林的计划、投资和组织机构等,使它能够更好地适应林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生产安排上也有片面性,例如,这些年强调了造林,而忽视了护林、育林,以致造林质量不高,保存率低,某些地区破坏林木的情况比较严重。

(二)作好造林规划,是更好地发展造林事业,满足国民经济各方面需要木材和林产品的前提。我国土地辽阔,地跨温带和亚热带,自然情况复杂,造林任务艰巨,而且造林是百年大计,与农业、工业、牧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搞好造林,就必须制定适合我国地区特点的、切实可行的造林规划。在制定造林规划时,必须根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正确地处理好林业与农、工、牧业的关系,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按照需要和可能,因地制宜地营造用材林、防护林和经济林等,逐步改变我国森林少和分布不均的状况。

过去几年,我们虽然制定了一些造林规划,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同时对处理农、林、牧关系和各方面需要木材的情况调查研究不够,因而这些规划不尽切合实际。加之在贯彻执行上又缺乏因地制宜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有些地方造林树种不适合当地需要,造了林又开了荒,有的幼林地变成了牧场等等。

(三)必须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参

加造林。既要坚持依靠社队集体造林，又要积极发展国营造林，同时广泛发动社员个人零星植树；有些地区，还要发展国家与集体合作造林。工矿企业、农垦、牧场、铁道、公路、部队、机关、学校等，也应当积极参加绿化建设。其中煤炭、造纸、人造纤维等主要用材部门，还应当有计划地建立自己的专业用材林基地。

(四)专业队伍的常年经营和群众的短期突击运动相结合，是搞好造林、更新的保证。依靠专业队伍，在造林前作好各项准备工作，造林时发动社员群众突击，造林以后又有专人管护，才能把林造好、养好。上面所说的雁北地区和电白县等地的造林，正是因为坚持了这种正确的做法，所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也有许多地区，往往只有临时的造林突击运动，而没有事先的准备和事后的管理，以致效果很差。

(五)必须重视林业的科学研究、调查设计和技术指导工作，按照林木生长发育的规律，制定技术措施，才能有效地提高造林、更新的质量。过去许多地方由于对此认识不足，造林不讲技术要求，缺乏技术指导，已经造成损失。实践证明，适地适树，良种壮苗，抚育保护等技术措施，是提高造林质量的成功经验，今后仍需积极推行。同时还要建立造林检查验收制度，以保证造林质量。

根据十三年来的实践经验，为了更好地发展造林事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自然面貌，必须高瞻远瞩，长期规划，及早动手，坚持不懈。我们正在着手制定林业建设的二十年规划。初步设想，今后人工造林，主要是造用材林，同时，还应该根据情况营造竹林、薪炭林、护田林、海防林、水土保持林、治沙林、木本粮油林等。并且，在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造林要求：

(一)在晋、冀、鲁、豫、辽、陕、苏、鄂、北京等省市，由于森林稀少，人口稠密，工矿集中，用材缺乏，应当着重营造矿柱林、造纸林、纤维用材林及防护林，同时发展核桃、枣、柿、栗等木本粮油林。

(二)浙、赣、湘、闽、粤、桂、川、黔、滇等省区，林木生长快，历来是人造林发达的地区。我国原有的杉木、竹子、油茶、油桐等人工林和马尾松、云南松等速生天然林，基本上分布在这个地区。群众造林和国营林场的基础都比较好，是我国重要的用材林、经济林基地，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巩固和发展这些基地。

(三)西北、内蒙古、东北的西部和沿海地区，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严重，应当积极营造各种防护林和治沙林。

(四)各个地区都应当积极发展四旁植树。在缺柴地区，必须大力营造薪炭林。

为了实现以上任务，我们考虑在近几年内应该切实抓好如下几项工作：

(一)加强林业生产的组织领导，搞好重点用材林基地的建设。

在国营造林方面，切实办好国营林场，着重抓好重点基地的建设工作。初步规划，在国营林场分布比较集中、条件较好的地区，选择一百八十多处基地、共八百多处林场，作为重点用材林基地。为了保证这些基地的建设，国家在投资、设备和技术力量方面，优先予以保证，并按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把林场整顿好。

为了使更新跟上采伐，必须正确地贯彻以人工更新为主、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的方针，切实改善采伐方式，为更新创

造有利条件。同时要调整、充实更新管理机构,按照定额配备更新专业队伍。

在群众造林、更新方面,为了作好造林、育林的技术指导,需要整顿和充实林业技术工作站。健全人民公社各级的林业生产组织,巩固提高现有社队林场、苗圃和专业队,并且为生产队培训林业人员。同时积极帮助生产队解决造林资金。

(二)办好国家和社队集体合作造林。由国营林场或林业站具体指导,造林前做好调查设计,造林后有人负责管理,并且规定合理的投资定额、质量要求和林木收益的分成比例。

(三)在最近几年内切实把采种育苗工作抓好,建立种子生产基地。要求国营林场和各市、县积极办好苗圃,同时积极发展群众育苗。

(四)切实抓好幼林的抚育管理,贯彻执行造管并重的方针,坚决克服过去只造不管的缺点。

(五)加强林业科学研究,促进林业技术改造。以现有机械造林林场为基地,系统总结机械造林经验,并试办更新机械林场,研究总结更新机械化问题。同时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为主,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办法,统一管理全国林业科学研究计划,统一安排造林、更新的试验研究网点,并且逐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使我国的林业科学技术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三、关于森林经营问题

加强现有林的经营管理,提高森林质量,扩大森林资源,这

是解决我国森林资源不足的另一重要措施，也是与造林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任务。几年来，森林经营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绩。大家知道，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一次森林火灾，可以烧毁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森林，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解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把护林防火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并且提出了“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全国的重点林区，都根据这一方针，在各级党政的统一领导下，层层建立了护林防火组织，订立了各种防火制度和公约。政法、农业、牧业、民航、气象和科学研究等有关部门，在防止森林火灾上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密切的配合。在坚持发动群众做好护林防火的同时，还在东北、内蒙古林区，进一步加强了护林防火设施。建国以来，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共开辟防火线六千六百余公里，修建主要用于防火的林道三千多公里，设置了防火瞭望台四百余座。同时开展了航空护林工作，先后在东北和西南地区建立了航空护林站，每年春秋两季防火期间，都有飞机巡视。

森林病虫害，对森林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的。几年来，由于积极采取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在防治技术方面，也从单纯依靠人工扑打发展到部分地区采用化学药剂、机械化和飞机撒药治虫。到一九六〇年，南方产竹地区基本上控制了竹蝗的发生，全国有一百多个县基本上控制了一种或几种森林虫害。

除了护林防火、防治森林病虫害以外，现有林的经营管理中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林木抚育改造。我国现有林中需要加强抚育管理的次生林约七亿多亩，约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一半左右，它是国家重要的后备森林资源，无论从目前和长远来看，经营好

这些林子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林子疏密不均，林木大小、好坏参差不齐，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抚育改造。通过抚育改造，一方面能够促进林木速生丰产，另一方面还可以生产出部分坑木和大量的小规格材及烧柴，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例如甘肃省天水市李子园林场，近五年来，组织群众抚育林木十三万八千多亩，生产小规格材七千八百多立方米，柴炭六千五百八十多万斤，小竹子三十万斤，加工各种竹子农具七百二十八万件，总产值达一百五十万元。通过抚育还能加速林木生长，据安徽歙县黄山公社山岔大队调查，一九五五年开始抚育，至一九六一年，平均树高三点三米，粗三点六厘米，比不抚育的树高生长快二倍，树粗生长快一倍多。

为了加强次生林的经营管理，全国已经建立起以经营为主的国营林场一千二百二十多处，有职工十万多人，经营管理的森林面积约三亿亩，抚育改造工作已在全国二十一个省区的重点林场铺开。同时还发动群众开展了林木抚育以及林副产品采集利用工作。

当前，在现有林经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森林火灾仍不断发生，毁林开荒和乱砍滥伐破坏森林的现象虽然减少，但还没有完全停止下来，次生林的抚育改造利用，开展得还很差。

为了加强现有林的经营管理，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一)进一步加强森林保护工作，有效地防止森林火灾和虫害，制止毁林开荒和乱砍滥伐林木的行为。为此，要继续加强护林的技术措施，例如开辟防火线，增设瞭望台，开展森林火灾天气预报，增建护林防火站、病虫害防治站和航空护林站等。

并恢复和建立行之有效的护林组织和护林制度，广泛开展群众护林运动。同时，健全护林机构，加强林业行政管理，并建议国家早日发布“森林保护条例”，以便各地在审理破坏森林案件时有所遵循。

(二)抓紧处理山林所有权。建议在今年内基本上把林权问题处理好，以调动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

(三)积极开展次生林的抚育工作。

一九六三年国营林场次生林抚育，已正式列入国家计划，今年抚育任务一百三十六万亩，生产木材五十万立方米，这一工作已经部署下去。同时，还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搞好次生林的经营工作。

此外，在森林经营工作中，还要注意发展狩猎和林副业生产。

四、关于木材生产问题

(一)一九六二年木材生产和几项主要工作情况：

一九六二年木材生产计划二千四百〇一万立方米，扣除国家计委批准四川省调减的九十万立方米之后，二千三百一十一万立方米。初步统计，实际完成二千二百〇四点九万立方米，为年计划的百分之九十五点四。

一九六二年木材生产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与一九六一年比较，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七点六。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九点三；成本降低了百分之六点五；产品质量也有提高。

总之，木材生产总的形势是逐渐好转的。木材生产取得这

些成绩,是与中央和各地党政的加强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抓紧了以下几项工作,有力地促进了生产。

首先,根据工业七十条,进行了企业整顿,生产秩序有所恢复。在许多企业中,贯彻执行了党委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恢复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了生产调度指挥工作。初步确定了企业的编制定员,建立了计划、财务、物资、劳动和技术等管理制度,改善了经营管理,加强了经济核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在整顿企业内部生产秩序的同时,还整顿了林区社会秩序,调整了企业的管理体制;同时,还普遍进行了精简,充实了生产第一线;并进行了清仓核资工作。

其次,积极维修了各种机械设备,提高设备利用率。东北内蒙林区现用的五种主要采运设备的完好率,已由一九六一年九月间的百分之四十一·九四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一·九(包括新增设备在内),可运用率从当时的百分之五十八·八,提高到百分之七〇·三(包括新增设备)。

第三、改进了劳动组织,推广了综合小工队的经验。目前在东北内蒙林区的一百四十八个机械林场中,已有四十七个林场推广了这项经验,使劳动生产率一般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伐区生产成本一般降低百分之三以上。

第四、改进了贮木场的管理工作,减少了贮木场混楞现象,保证了木材及时调运。混楞的贮木场已由八十八个,减少到十四个,有二十六个场初步实现了木材商品化管理。

目前,北方林区的各林业企业,正在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三个主义”教育,广大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显著提

高,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冬季集材到三月八日,已提前完成计划,商品到材计划一、二月份也都提前完成。南方各地也正在抓紧时机,为春水流送作好一切准备。以上这些情况,都为我们进一步搞好生产,争取完成超额完成今年的任务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一九六三年的生产计划和几项主要工作

一九六三年全国计划生产木材二千二百六十九万立方米,比一九六二年实际完成数约增长百分之三点二。为了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木材生产计划,我们除了认真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在职工群众中,加强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外,并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抓紧当前的大好形势,努力增加生产。东北、内蒙林区要抓紧解冻前的有利时机,力争多搞一些集材。要求到三月底在提前完成任务的基础上再多集材九十五万立方米。这是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原木生产任务的关键。同时,还要抓好生产转季工作,切实安排好劳力,及时转入常年作业和基本建设、更新造林工作。

南方各省区要抓紧组织好春水流送工作,力争上半年多到材,以争取全年主动。

第二、加强林区建设,积极修筑林区道路,迅速开发新林区,不断提高木材生产能力。林区建设特别是交通建设,是合理利用森林,增加木材生产的开路先锋。十几年的经验证明,要提高木材产量,除了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潜力和充分利用森林资源以外,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抓紧开发新林区。十几年来,我们在全国各主要林区新建并投入生产的有八十二个林业局,建成森林铁路六千四百八十二公里。运材公路一万三千四百〇

九公里。但林区基本建设还远远落后于木材生产的需要，特别是林区道路延伸不够，所以大量的森林不能被开发利用，木材产量不能迅速地持续的增长。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今后，我们打算，大力加强基本建设工作，建立机械化筑路队伍，积极修筑各种林道和整治流送木材的河道，争取尽快地把现已开发的林区采伐面适当铺开，加速实现合理的轮伐制度。同时，有计划地积极地开发新林区，建立新的木材生产基地。

为此，要求国家尽可能多修一些林区大铁路。林区没有大铁路，物资、劳力运不进去，生产的木材运不出来，森林工业的基本建设和生产也就无从搞起。

林区内部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修路。没有道路就没有森林经营，也不可能采伐利用。

解决电力供应也是当前木材生产中的一个重点。东北、内蒙林区共需电十四点二一万千瓦，在国家电力网内的企业需电三点二万千瓦，但目前国家电力部门只供应了三分之一左右，在国家电力网以外的企业需电十一万千瓦，而现在企业的自发电能力只有四点四万千瓦，远不能满足生产需要。

第三、继续发展木材综合利用，严格节约代用木材。近几年来，木材加工，综合利用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林业系统的锯材能力一九五七年为三六〇多万立方米，目前已提高到五百万立方米左右。大跃进以前，我国根本没有纤维板工业，胶合板的产量也很低。大跃进以来，从无到有，建设了许多纤维板厂，目前继续生产的尚有三十八个厂，新建了六个刨花板厂，对解决木材不足问题，已获得初步成效。节约代用木材的工作，也日益开展起来。

但是，总的说来，木材综合利用事业还很落后，大量的废材

废料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木材节约代用也待进一步开展。为此，我们今后拟进一步加强木材综合利用和节约代用工作。首先在综合利用方面，要坚决贯彻中央关于节约使用木材，改调成材的指示，除了坑木、电柱等特殊材种以外，其余的，应全部就地加工成材，然后再外调。并且要认真整顿提高现有的各种人造板厂，改进生产技术，尽快配套成龙，使之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同时，要积极发展木材干燥、防腐工业。

在节约代用方面，要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节约木材的指示，在木材生产企业内，千方百计地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损失浪费现象；在木材使用单位应积极提倡节约代用。如提高加工出材率，加强商品包装箱的回收利用，进一步推广水泥轨枕、水泥矿柱等等。

第四、继续贯彻“工业七十条”，抓紧整顿企业，改善劳动组织，继续推广综合小工队的经验，全面地改善经营管理，争取在今年内把劳动生产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

与此同时，还要狠抓机械维修、管理工作，继续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和利用率。

目前的林业建设，基础更加坚实了，职工队伍更加壮大了，经验更加丰富了，人们对于林业的认识更加提高了。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林业建设十分关怀和重视，使全体林业职工感到莫大的鼓舞。因此，应当肯定地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充分运用有利条件，战胜一切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使林业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

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我们的祖国已经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到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了。象我这样在旧中国度过五十多年的人，面对着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并且能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为国家为人民贡献一点力量，深感自豪。

回顾过去，对比现在，感触很多。感受最深的，一是我国人民的团结，二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二十二年来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

中国的近代史和解放二十二年来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必须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得救，才能富强，才能进步发展。反之，不管是谁，只要是反对统一，反对团结，反对人民，就必然要失败，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罪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给中国指明了出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了全国广大人民，使国家面貌日新月异。我们要想国家取得更伟大的成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与统一。

* 本文曾载香港《文汇报》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日。

其次，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各国人民要求和中国人民友好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方面我也感触很多。

我出生在甲午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年。此后，是帝国主义不断入侵，占领中国的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它们采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侵略和压迫手段，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我的前半生，耳闻目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除了汉奸卖国贼外，对这些侵略、压迫和剥削，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是满腔愤怒的。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主席讲出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从此以后，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新中国成立二十二年来，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我们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提案，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生动地反映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

以上两点，凡是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我想都会为之欢欣鼓舞。

台湾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统一祖国，是全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是全中国人民的庄严职责。为此，我希望在台湾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很好地认清当前的形势，要勇敢地发扬自己的爱国心。历史已经

充分证明，只有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繁荣富强。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着一切爱国人士。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作了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都将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欢迎。二十二年来，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我耳闻目睹的事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始终一贯的。我虽然没有为人民做出多少成绩，但是我一直受到人民政府的优厚待遇和照顾。

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是伟大的，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它将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也希望在台湾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能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贡献力量。

新春寄语*

新春又到。

在一年一度的春节里，按照历来的传统，总是要说几句“除旧布新”、“万象更新”之类的话。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话作为陈词滥调，而是按照这些话的精神，切实地总结过去，计划未来，倒是很不错的。我们的国家，正因为每年都在“除旧布新”，所以才能有今天的“万象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同它二十四年前相比，现在是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了！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新的一年，还将更进一步。我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初步繁荣昌盛而自豪，为它进一步地繁荣昌盛充满信心。

由此，我不能不想到台湾省，不能不想到在台湾的国民党老朋友。在这个传统的节日里，你们大约也看到、听到“除旧布新”、“万象更新”之类的话吧，你们对这些话切实地想过没有？你们打算如何“除旧布新”，促使“万象更新”呢？旧中国的“旧”特点之一，是分裂；新中国的“新”特点之一，是统一。但是，二十四年来，旧中国的这个“旧”特点，还未能完全消除，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怀抱。在台老友们，彻底消除这个“旧”特点，此其时矣。

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早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省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热烈希望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主张“回归”的言论，日益

* 本文是一九七四年春节的对台广播稿。题目是原有的。

公开和强烈；甚至一些在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吟诗作赋，抒发怀乡之情，侧面地表达了同样的愿望。正是根据全国人心所向，我国领导人，多次发出号召和希望，促使台湾回到祖国早日实现。

在国际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势的趋向，十分明显。甚至你们以为的最大依靠——美国政府，它的趋向不是也很明显吗？

这些方面，我想你们是很注意，也很受震动的。所谓“处变不惊”，正说明震动之大。如果不是这样，何必急忙提出这个口号？应该受到震动，然后在震动之余，认清人心和大势，按照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去做有益于国家民族，有益于人民，也有益于自己的事情。

老实说，我对于某些人当前的顽固表现是极不满意的。他们对于台湾问题，提出所谓“三不方针”。第一个“不”，就是“绝不妥协”，拒绝谈判。显然，这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背道而驰，不是“合乎世界之潮流”，而是“逆乎世界之潮流”；不是“合乎人群之需要”，而是“反乎人群之需要”，哪里还有一点孙先生信徒的韵味！“三不方针”的另外两“不”——不搞“台独”，不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孤立看，似乎还有民族意识；但是，同第一个“绝不妥协”联系起来，就大有问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凡是中国人，都应当坚决反对“台独”。但是，所谓的“反攻复国”有丝毫可能吗？从来就没有。还有人受骗吗？大约也没有了。那些最爱叫喊它的人也明白它已毫无市场，因此近来这种叫喊也较少了。那末，在这样的情况下，既反对“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又拒绝回到祖国怀抱，“绝不妥协”，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试问，顽固坚持“绝不妥协”，难道不正是有着向“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靠拢的危险吗？台湾一定要回到祖国怀抱，“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完全行不通，谁要这样做，只会彻底失败，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如果真有中国人的良心，真正是坚持一个中国，唯一的道路是回到祖国怀抱。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陈兵我国边境，亡我之心不死。投靠苏修，引狼入室，会受到亿万人民的唾骂，成为千古罪人。这种卖国主张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化的情况下，仍拒不回到祖国怀抱，怎能保证抵抗苏修对台的巧取豪夺？怎能保证台湾不出现今日的石敬瑁？所以，如果真从民族利益出发，防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之患，唯一的道路，是回到祖国怀抱。离开这个前提而侈谈不投靠苏修，正象古人说的：“非愚则诬”。

总之，所谓“三不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方针，也是自相矛盾的方针，行不通的方针。如果真正爱国，就必须把“三不”改为“两不”——不搞“两个中国”、不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更要加上一“要”——要回到祖国怀抱，这才是正确的方针。事关国家民族，愿在台老友，对此有明确的认识。

环顾世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遏止的澎湃洪流。伟大的中国，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之下，在这革命洪流中，成长壮大。在这革命洪流推动下，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已是势所必至，日益接近现实，谁要抗拒也抗拒不住的。爱国不分先后，凡是做了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都会受到欢迎。

新春寄语在台老友，愿在新的一年里，除旧布新，顺潮流，应人心，为实现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而努力！

后 记

刘 元 彦

三联书店出版我父亲这本集子，让我写篇回忆的文字放在末尾。展读遗著，首先浮起的念头是：如果父亲活到现在，看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巨大变化，那该有多好。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父亲因癌症去世，终年 82 岁。达到这样的高龄，是超出大家预期的。他的身体自来不算好，但解放以后，精神饱满地工作了许多年，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次重病之后，身体才逐渐衰弱下去，进入暮年。然而，就在这最后几年中，他仍然坚持学习，坚持锻炼身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几年，正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的精神是压抑的。但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前景，仍然充满希望。一九六九年以后，他多次病危。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在有关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下，他一次又一次地渡过险关。如果不是后来患了癌症，他一定能够看见“四人帮”的被粉碎，看见我们国家扫除阴霾，重见光明。只差三个多月的时间，他终于怀着对祖国的担忧而去世，这是多么遗憾的事！

写回忆父亲的文字似乎是容易的，因为对他那样熟悉，好象可写的东西很多；但真正拿起笔来，又感到困难，因为毕竟是两代人，而且解放前我年纪轻没能参与多少事情，解放后又是各做

各的工作，因此要写出读者愿意看下去的东西，也不那么容易。我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写些见闻，作为这本集子的零星补充吧。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广大人民欢欣鼓舞，盼望着祖国统一、繁荣、富强的日子早些到来。然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倒行逆施，完全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他们背信弃义地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更加腐败，经济江河日下，人民生活比抗日战争时期还要困难。这一切，使我这个大学生，日益愤慨，因此，逐步倾向革命，参加一些进步的学生运动。我的这些活动，我父亲当然不可能没有觉察，但他从不干涉，这就使我觉得他是开明派。稍后，我和一些进步同学，参加进我父亲出资办的《西方日报》做一些工作^①，从那里知道他给报纸的方针是“中间偏左”；由于资助一些进步同学继续读书和支持学生运动，我曾向父亲要钱，他有求必应。这些，使我觉得他是同情进步活动的。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春以前，我丝毫不知道他和党早有联系。

一九四八年春，中共四川省委要同我父亲面谈，通过和我要好的同学胡庚炳，让我给联系。这在蒋介石的“戡乱”的反动政策下，当然是“大逆不道”的事。根据前一段的情况，我估计，即使父亲拒绝面谈，最多把我骂一顿，但是否同意谈则毫无把握。出乎意外的是，我讲完后，他告诉我：党中央早已派人和电台秘密住

① 《西方日报》由我堂兄刘元道任董事长，开办之初，就邀约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作为报社的骨干。我和一些年轻同志，组织方生社，先在报纸编一个副刊，后在报社编辑部帮助下，又创办《西方夜报》和《民讯》杂志。一九四九年春，王陵基悍然查封该报，抓了人。编辑部大多数人转移到雅安。

在雅安^①。他接着说，他们都是单线联系，并同意和四川省委的代表面谈。这是多么使我高兴的事，不仅同意谈，而且早已开始走向人民了。那是一九四八年初春一个早晨，他当时正一个人吃早点，情景历历在目，印象非常深刻。此后，他还告诉我一些他和民革、民盟联系的情况，给我看过李济深先生等人捎来的、写在绢上的亲笔信，让我接待过民盟由重庆到成都来的人；一些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通过我、得到父亲的同意，去西康隐蔽起来，也多次顺利进行。

党中央派王少春同志和电台住雅安，在我知道之前，只有我母亲和极少数人知道，一直严格保密，以致父亲通电起义后，王少春同志在雅安公开出面，还被地下党的一些同志误认他为我父亲的高级参谋。《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文，叙述了王少春同志及电台，对父亲的起义所起的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还说：

“王（少春）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我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我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读到了。因此，我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

这里讲的“每天……传达”，决非夸大之辞。在我知道这个秘密电台之前，我父亲回成都或我假期去雅安，就见到他每天看毛笔抄写的新华社电讯稿，当初以为是父亲叫人收抄，后来才知道这

^① 据我母亲回忆：党中央决定派电台住雅安，同时还拟派电台住邓锡侯、潘文华先生两部，并均已达成协议，后因故未成行。

是党中央派来的电台送来的。如果父亲去重庆开会，电讯稿则由母亲收存等他回来再看。总之，从未间断。我去雅安时，也曾见过王少春同志晚上来我家同父亲谈话。谈话时我当然不在场。后来听父亲说，这种谈话不时进行，其内容，除形势的分析之外，也包括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解释。例如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王少春同志对此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了充分的说明。

文章讲的“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包括上述内容，也还有更广泛的意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文写了一九四九年九、十月，周总理曾通过电台给我父亲一个电报，大意说：“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这个电报，不仅指导了我父亲起义前的行动，而且从思想上深深打动了他、教育了他。解放后他不只一次地讲述此事，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决不是临时利用的政策，而是从全面考虑如何对革命更为有利出发的，也是真心实意地照顾朋友的。这个电报，同蒋介石对待其非嫡系部队的“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的恶劣手段，是鲜明的对比。而在周总理这个电报之前，王少春同志也已提出过类似的意见，希望我父亲埋头整训部队，积蓄力量，待机行动，对蒋方要善于因应，不可操切，充分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文还写了这么一件事：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就动手解决龙云。在事变的午夜，王少春同志收到这一消息立即告诉我父亲，并提出，应镇静处之。还可补充一点事实：黎明，王又收到蒋发表我父亲为伪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的消息，又立即转告，并分析说，蒋暂时不致对我父亲下手。此外，在起义之前，王还对我父亲说，要积蓄力量，但袍

哥力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依靠。这些，都是我父亲作为党爱护民主人士的事例，在解放后告诉我的。

顺便补充一点情况：王少春同志住雅安，一行共三人，还有他爱人秦慧芳同志和报务员（不知其名）。他们在八年的时间里，一直深居简出，生活朴素，自种蔬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一九四九年秋，我从成都去雅安。当时，西南快要解放的形势已经摆得很清楚，而胡宗南图谋夺取西康之说也越来越盛。我父亲将如何行动呢？何时起义呢？我不知道，心里未免有些着急。那时住在雅安的一些地下党员、进步人士也有同样的心情。有一天，我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他笑而不答，随后说：讲给人听的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了。但是我看到，他散步沉思的时间加多了。十月，他决定去成都。这个决定使许多人都觉得危险太大，纷纷劝阻。但他不为所动。我掩护去雅安的一位地下党同学（当时的名义是我父亲的秘书）也劝他不要去成都，他回答说：你不懂得。去成都，西康之祸缓；不去，其祸速。他就是这样衡量时势，贯彻周总理上述电报的精神的。

从雅安到成都，是为了应付蒋方，拖延时日，等解放大军靠近之后再行起义，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各方面的联系以及策反工作的进行。但最初的打算，还是准备到一定的时候就回到雅安起义；后来在彭县起义，是形势演变临时选择的。首先是国民党胡宗南等部，在解放军的追击下，望风溃败，却还保有几十万人马退到川西。如果回到雅安而暴露起义的意图，很容易被他们消灭。其次，王陵基纠合一些保安部队摆在成雅道上，回雅安很可能在路上被阻击。当时的形势是：多拖

一天，解放军就更靠近一些，就对于阻止蒋军向西康、云南逃窜并进而围歼蒋军更有利一些；但是，多拖一天，对个人的危险也更大一些，要从成都出走就更难一些。因此，在彭县起义前的半个月中，特别是蒋介石逃到成都后的那一周的时间里，父亲的工作是十分繁忙而处境又是十分危险的。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已经较详地记述了这一段的斗争经过。

当时，父亲没有让我参加准备起义的具体工作，因而我并不忙；但侧身其间，对周围的紧张气氛是感受颇深的。先是发现蒋帮的特务，在我家的四周越来越多；接着是蒋方向父亲提出送家属去台湾，推托之后，张群亲自出马劝说我母亲先去台湾，被谢绝后又指名要送我去香港；同时用种种手法企图胁迫父亲同胡宗南等“合署办公”；步步紧逼，随时都有下手的可能。我们当然准备离开成都，但又不能露出痕迹，引起怀疑。后来形势发展，回雅安看来不行了，而全家跟随父亲出走又目标太大，容易暴露，于是决定分散隐蔽。分散隐蔽到什么地方，事先作了安排；但什么时间离开住所却不能预定，目的是多拖一些时间。十二月六日晚，张群将去云南来向父亲辞行；同时得知胡宗南的盛文部将于次日晚接管成都市城防的消息。父亲判断蒋方可能即将下手，于是深夜立即行动，乘车离开家里，按预定计划，我母亲和妹妹去中医王朴诚家，我爱人和孩子回她的娘家，我随父亲住西御街邹荫萱的家里。七日晨，我父亲说他回家去看看，让我在那里等着。原来预定我随他一起出走的，没想到忽然来人通知说，他已出城，叫我立即转移到成都南门外乡下他的旧部邹善成家，去同先到那里的熊克武先生住一起。我只好如命立即出南门，然而心里十分懊丧。回想起来，在那危险四伏、生死莫卜的时候，

这是防止如果失利就同归于尽的安排。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窥见父亲当时下定了经受各种危险的决心。

正当我隐蔽在成都南门外乡下、焦急地盼望着解放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我父亲同邓锡侯、潘文华先生一起在彭县通电起义了，电文由党中央派在雅安的电台发出（据我所知，经我父亲作了一些工作宣布起义的董宋珩、罗广文等部的起义电，稍后也是从彭县转雅安、由这个电台发出的）。从成都出走后，我父亲由于长期劳累和感冒，气喘病大发，曾有一两天卧床起不来，但仍然带病处理纷繁的军政问题。那时，我父亲的起义部队，在成雅（成都到雅安）、乐西（乐山到西昌）线上阻击蒋军（稍晚一些，还有丹康〔丹巴到康定〕线上的阻击战），总目标是阻止蒋军向康、滇逃窜，以便解放军将它包围、聚歼于川西平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解放军还未到来的一个短时间内，形势是吃紧的。特别是成雅一线，是蒋军窜入西康的主要路线，雅安又是我父亲起义部队二十四军军司令部所在地，战斗最烈，压力最大。（详见《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西康的阻击战》一节）当时，军事上由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在雅安指挥。他一面和我父亲密切联系，一面将情况随时向王少春同志汇报，并立即报告中央军委。同时，王少春同志把军委通知的关于解放军的进展情况告诉刘元瑄、杨家桢（二十四军参谋长），并一起商定应对方案。在这样密切的联系下，解放军及时赶到，蒋军除数千残兵外，全部未能逃到西康、云南，最后被解放军歼灭于川西平原。后来，刘元瑄、杨家桢都曾告诉我：在战事吃紧的那几天，他们在雅安已经准备了疏散家属、部队转移到山区继续阻击的方案。如果解放军再晚些天才到，说不定雅安会被蒋军突破。

可见，我父亲的起义，不仅政治上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军事上也同样是在党的领导下、密切配合解放军的。因此，我父亲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写道：“西康的和平解放，应当归功于共产党，归功于人民解放军，而我自己的努力实在是说不上。”

一个在反动阵营中长期掌权的人，为什么能够冒着危险起义呢？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末尾，我父亲概括全文作了回答，他说：

“我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开始反蒋起，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彭县起义止，经历了整整二十年。这漫长的岁月，是在反蒋和亲共的道路上度过的。我的反蒋本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却因失败而倾向于亲共。我的亲共也是违背阶级利益，亦因时势推移由假变真而导致了起义。其所以能如此，党的领导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党热情地争取我，团结我，教育我，支持我，使我逐步认识了真理，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取得了前进的力量，然后才有可能背叛反动阶级，参加人民阵营，踏上新的光明的政治前途。从我过去长期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深切地体验到党的伟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

读了这篇回忆文章，再看这段概括性的结语，大约都会承认这是坦率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这段话在写成文字之前，我父亲已经口头上讲过。有人曾经提出，“由假变真”的提法是否妥当，但他在这篇文章中仍几次写出，而且进一步说明：“即由原来利害上的暂时利用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长期依靠”。据我的理解，这个“由假变真”，从客观上

讲,就是“时势推移”使他不得不变;从主观上讲,就是党对他的争取、团结、教育、支持,从内心上打动他,使他从“长期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深切地体验到党的伟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思想上有所变化。因此,他认为“党的领导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解放后,父亲曾对我说,他第一次从内心钦佩党,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党当时决定释放蒋介石,联蒋抗日,使他深感意外。他说:这是真正为国家民族着想并有伟大的气魄,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一系列主张,他从心里赞佩;而对蒋介石的发动内战深为不满。他解放后对我说,蒋介石迷信武力,没有政治眼光,不顾国家利益,不管人心向背,怎么能不失败。他还说:中国人受了多少年的压迫,绝大多数都是有爱国心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建立在爱国这一点上的,所以成功。这些话,和他文章中写出的许多事例一样,都是他对“党的伟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伟大”的体会。

《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文,写成一九六二年。可以认为,解放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他身上继续发生巨大作用,因此,在总结解放前的一段历史时,认识才能如此明确。

一九五〇年春,父亲从成都到重庆;同年秋,到北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后返回重庆。这段时间,我都同他在一起。当时,四川刚解放,各项工作有待开展,父亲虽然还没有具体职务,但许多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除开会之外,周总理、朱总司令、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领导同志,都先后同父亲个别谈话,有的还多次长谈。当然,多数谈话我没有在场,但从他的情绪可以看出,谈话对他的鼓励是很大的。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贺龙同志

对他的一次谈话。那是一九五〇年春刚从成都到重庆不久，贺龙同志来我们的住所谈的，谈话是聊天式的，所以我一直旁听。贺龙同志讲他自己的经历，从如何拉队伍，如何当镇守使，如何倾向革命，如何在南昌起义，如何入党，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根据地，如何抗日，以及如何克服外部的、内部的和自己思想作风上的各种问题，……足足谈了一个下午，坦率、热诚、风趣、乐观，对自己的经历和过去的缺点毫不隐讳，现身说法，鼓励我父亲继续前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做统战工作的，现在想起来都还令人感动。同时，他和西南的其他负责同志，还不断地关心我父亲和我们全家的生活，非常亲切，使我们感到真是一家人。

对我父亲来说，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能否适应和做好革命工作。最初，他在这方面缺乏信心，曾经有过消极的念头：起义的历史任务完成了，年纪也不小了，将来只备咨询就行了。但是，党要求他作为统一战线的一员继续发挥作用，不断地从思想给予教育和鼓励，同时给他挑重担，安排工作，鼓舞他继续前进。这样，他很快打消了消极思想，努力地学习和工作。我父亲从来每天必读各种报纸、刊物，但理论上缺乏系统的学习。解放后他很注意克服这方面的弱点。他学习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还学习一些马列著作，除学习会讨论外，还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和周围的同志讨论，有时也和我讨论，可见他的学习是认真的。一九五九年调任林业部长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还阅读有关林业的杂志和《森林学》之类的书籍。他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后改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职，同时兼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被选为

常委)、历届全国政协委员(后被选为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委。在党的领导下,他努力作好各项工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总是无保留地提出来讨论。在林业部工作期间,由于党内外合作好,曾得到周总理的口头表扬。这本文集的文章,部分反映了他的工作和学习的情况。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但每年总有一两次在父亲来京开会时见到他。每次见面他总是给我讲一些四川的新面貌。一九五九年他调北京工作后,作为人大代表或林业部长,每年都要到外地视察。每次回来,他总要讲一些新事物给我们听。这本集子中所收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和《江西省的山区建设和林业建设》的内容,他都兴致勃勃地讲过。从对社会主义新事物的敏感和赞助态度来看,他一直实践着他解放初期提出的“否定过去,肯定现在,相信未来”的原则。

这里,我还必须写周总理对我父亲的教育和关怀,以及我父亲对周总理的钦佩和信服,虽然我知道的远不全面。

我父亲不只一次地说过:毛主席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真伟大。周总理最完美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话,是他根据解放前后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讲出来的。我父亲在解放前的一系列进步活动,是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进行的,具体说,是在周总理完美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领导下进行的。在每个形势变化的关头,周总理都及时地给予指导,使我父亲不致走入歧途。《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文,对此已有具体论述,不再重复。解放后,形势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但周总理这种及时的指导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更为具体。例如:一九五〇年父亲起义后第一次到北京、一九五九年从四川调北京工作,周总理

都亲自和我父亲个别谈话，提出新的要求和希望。至于根据形势和任务随时提醒应注意什么，那就更多了。我父亲对周总理给他的帮助，总的感受是：循循善诱，使你能够不勉强地跟上新的形势和要求。

周总理对父亲身体的关怀，是无微不至、令人感动的。一九六六年，林彪、“四人帮”趁文化大革命之际，煽动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大搞打、砸、抢、抄。周总理非常关心我父亲的安全和健康，命令专人护送他到某医院“疗养”。一九七二年父亲不慎跌断胯骨、并发肺炎，病情比较危险。周总理指示医院用一切办法全力治疗，将病况随时向他报告。一九七五年医院发现父亲得了癌症，汇报后，周总理又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寿命，只要有危险就随时向他报告。敬爱的周总理是这样地关心别人，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时他自己早已得了癌症！

我父亲一直把周总理看作他的良师益友；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把周总理看作党的统一战线的存废、国家的安危之所系。有几年没有机会和周总理面谈了，一九七二年一次会后，父亲见到总理，忍不住要表达他上述想法。他对周总理说：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二十四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他回家后把这事告诉我，并说，总理听了哈哈一笑。

一九七五年，我父亲又一次病危，他感到可能不起了，几次嘱咐我们说：以后要紧跟党，紧跟毛主席，紧跟总理，总理好。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总理逝世。噩耗传来，我们全家震惊，陷于深深的悲悼之中。那时，父亲刚从医院回家，还十分衰弱，不能行动，而且正是严冬季节，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医生、家人，都劝



2 034 5938 2

24

他不要外出,但他非去不可,结果让我们用小车推着他向周总理的遗体挥泪告别。不久后,他再次住进医院,六月去世。他去世时周总理已经不在了,但他的遗言我们是一直铭记不忘的。

父亲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了。他一生的功过,将由后人来评论。但我想,他的爱国思想总是会得到肯定的。他晚年常说:我的起义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这个愿望达到了,又没有完全实现,台湾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他深信,中国人、包括他在台湾的老朋友,绝大多数都是有爱国心的,国家的完全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总是努力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一九七四年春节,他写了篇对台湾的广播稿(即本书的《新春寄语》),还不顾病体,在医院录音然后播出。他就是这样切盼着祖国的统一而尽自己的力量、最后以没有亲见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感到遗憾的。在目前国内、国际的大好形势下,父亲这个祖国完全统一的愿望,将会更快地实现。台湾回归祖国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到那一天,我们会把这个你切盼的好消息告诉你的,父亲!

(一九七九年五月)

封面
目录
正文